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3 年 11 月 30 日第 25 期

## 本期目录

【非正常死亡专辑】

史林一叶

赵瑜 是谁杀了王尚志

忆旧思亲

散淡天涯 班长周瑞清之死

何蜀 母亲的好友穆淑清之死

故纸堆

李晓航 录入提供 江西武斗初期一份死者名单

中共宾阳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宾阳县“文革”大事件

简讯

宗庶 让更多公民、更多青年来记录历史

——“2013 历史嘉年华”活动圆满结束

编读往来

阎长贵谈抢救文革史料

熊景明谈文革史料与志愿者

王春南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张一哲对杜钧福意见的回复

---

## 【非正常死亡专辑】

说明：“非正常死亡”是一个应载入文革词典的词条。本来，在和平年代，除去地震、台风之类天灾以外，因“人祸”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应该十分少有，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却一次次大规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出现了几次高潮（1966 年“红八月”开始的“破四旧”，1967 年夏开始的大规模武斗，一些地方在军政领导授意或布置下对所谓“黑五类”及其家属的大规模屠杀，1968 年秋开始的“清队”，1970 年开始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更耐人寻味的是，“非正常死亡”在文革中还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评判，当一些

人在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而自杀之后,当时都会被认定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按“非正常死亡”处理。而到了文革结束之后得到平反昭雪时,在新的结论中则往往会写上“按正常死亡对待”或“按正常死亡处理”。后人将很难理解:这怎么能算“正常死亡”呢?他们不了解“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曾经是一种对死者的政治评判,涉及死者及其家属的政治名誉和相应的经济待遇。

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为什么会大量发生?是怎样发生的?有些什么类型和特点?到底有多少人应列入这个非正常死亡的名单?……这些都还很值得调查、研究。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能提供所了解的情况,留下历史的证言。

---

【史林一叶】

## 是谁杀了王尚志

赵瑜

按:本篇系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尚未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反映文革中晋东南大规模武斗的《牺牲者》一书中的附录1。

### 立场不同判断两异

文革之初,长治地面上红字号、联字号两派尖锐对立的一大焦点,是晋东南地委第一书记王尚志之死。

1966年12月底,王尚志的尸体从长治市南郊农田里一口机井中打捞上来,腰间拴着70多斤重的砖头石块。人已经泡肿,死去好几天了。他的死,引发了山西上层和各地、市委正在经受空前打击的干部们的深切同情。好端端一名地委书记,怎么就这样死了?疑为造反派所害的怨声骂声呼声,连成一片。而失踪当晚,最后一批纠缠斗争王尚志的造反派,正是潞安中学联字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字号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极力洗刷自己。此时,内外交困中的地委第二书记全云、专员张行夫、长治市委王景生书记等,出于对同仁惨死的强烈哀怨,出于对这场疯狂无序大运动的深深反感,也宁愿认为,这位好书记就是被造反派害死的。

当王尚志失踪后,全云书记和张行夫专员还有王景生书记,在夺权前所行使的最后权力,就是组织整个地委、市委直属机关的干部们,动员全社会力量配合行动,在长治城乡展开大查寻。城壕、沟坎、厕所、水塘;小巷、高楼、校园、厂矿,遍寻失踪不见的好书记。终在一周后,用大镜子反光照射技术,在南关农田水井深处,发现了死者身影。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真尸体,便是这位以凝重的大红脸庞吓坏了我的王尚志书记。——当时他的尸体摆放在东招待所大屋中,让人祭奠,实际上就是干部们对造反派暴行的无声控诉。尽管在冬天里,还是有人搬来了河中大冰块,置放在屋内,以防止尸身腐烂。那时北风凛冽。印象中,就这样公开摆放了好几天,力

图让广大民众看一看想一想：造反派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分裂即将形成。大局正是如此：不出俩仨月，造反阵营联结成为联字号，保守群体衍生成红字号。这是两大派的老底子。

王尚志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调来这里不足两年，作风朴素谦和，从不搞帮派。又传说他年轻时，在塞外雁北是位有名的抗日英雄，群众对他感情很深。夺权大动荡之后，红字号充分地顺应了群众的怀疑与不满，很快与来自内蒙古，来自本省雁北地区“为王尚志报仇”的串连人员，结成了同盟军，愤怒声讨联字号残害革命好干部的罪行，使他们不得人心，借以争取群众，成为反击联字号以及军分区的一项战略步骤。

王尚志到底是自杀还是被害？造反派一时间也向群众说不清楚。造反派只能呼喊：“决不允许以死人压活人！更不允许以死人压运动！”显得苍白无力。红字号最早的跨行业结盟大组织，本来有各种名称，后来索性打出“为王尚志同志报仇大军”的旗号。而另一重意思，誓为王尚志伸冤雪恨，也可以曲折地反映出，红字号许多成员正在为仝云、张行夫、王景生等领导干部大鸣不平，当时谁也不好公然站在保护“走资派”立场上。而高一层“当权派”的存灭，代表着中一层“当权派”的存灭，进而又代表着更多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得失兴败，上上下下命运休戚相关。所以，当权者总是有人同情有人保护的。而带头造反者，不是一无所有惟锁链在身的赤贫者，便是积怨已久受到无情压制的失意人，再不然就是反正两手空空，乱世一搏或有人生斩获的赌徒们。

王尚志到底是自杀还是被害？这不仅是诠释晋东南文革血战不可缺失的一环，也由于笔者当年刻骨铭心吃过惊吓，对案底好奇日久，也就成了我在调研中尽力破解的一桩要案。

王尚志之死，触发了许许多多人对文革动乱的不满，逐步发展到两派立场观点的对立与争端。半年后的7月间，红字号聚众围困军分区四天四夜，不依不饶，打的仍是为王尚志报仇旗号。传单上说，“王尚志之死，是晋东南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

要说王是被害致死或是害死后移尸第二现场，在当时很容易让人相信，人们宁愿接受这类推论。总的心理前提，在于好人普遍受压无奈，不满于天下大乱坏人横行。好端端一个书记难道会自跳井中？分明是坏人乘机作乱！在当时，各地确有乱中滋事报复杀人的现象。据高平县老干部乔高升先生回忆，他们县里就有这样的事。2004年夏季我采访他，乔先生脑力甚好，表达清晰。他说：天下无政府，好人要受苦，在高平县造反派宣布夺权的当天，县政府垮了，高平城里不等过夜，就连续发生了五起杀人惨案，集中在几个小时之内，有的被抛尸街头，尸体上还插着刀子。乔的看法，全部是乱中作案，报复杀人。

我还听广东的朋友们说过，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的母亲和儿子，在文革中惨死，也与报复仇杀有密切关系。

不幸中的万幸，王尚志书记在1966年12月底死去时，造反派尚未大举夺权，以仝云为首的地委当时紧急向省委汇报，省、地、市三级旧政权在最后的惯性运

行中，组织专人进行了艰难的破案工作，尽管当时组织破案的出发点，是要抓出“敌人”来，是从“被害”切入的。但是毕竟省里派来了名牌法医王克峰主刀解剖，专案组为历史疑案留下了第一手侦勘资料，地、市公安干警搜集和检验了大量线索，甚至还抓紧了最后掌权时光，把法医获取的解剖样品，急送上海做出权威鉴定。——20天以后，大夺权开始，应该得出的结论尚未完工，应该揭开的谜底尚未亮相，破案工作当即被夺权所冲垮，更加浩大的两派社会斗争全面展开，此案被迫搁置下来。

公检法被砸烂。直接负责侦破此案的地区公安处处长、刑侦专家白玉山，也受到运动冲击，全家被下放到壶关县大山深处。又是不幸中之万幸，这批破案材料经过多人保护，神奇般地存了下来。为十几年之后地委重新组织破案，留下了铁的证据。——这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

换句话说，此案发生的时间如果稍稍晚一点儿，赶上大夺权前后，一切侦勘与证据将不存在，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结论。叹文革运动，全国各地发生数不清的死亡惨案，给历史给后世留下了数不清的悲凉谜团，不明不白，至今欲破不能，正是因为没有了当时的依据。

地委书记王尚志，一位抗日老英雄，到底怎样死的？人们站在各自立场，做出顺乎各自利益的主观推断——

善良百姓们认为，是丧尽天良的坏人害死的；

老干部即所谓“走资派”们，认为是造反派给害死的；

未能掌权的晋东南红字号，认为是抢班夺权的联字号害死的；

而造反成功的新贵们，认为是“老走资派”们为保自身给害死的。

各敲各的锣，各吹各的号。在王尚志死后八个月，山西省以刘格平为首的新政权，召集晋东南核心小组程首创、武天明、刘凤翱、李顺达、崔修德等人在太原迎泽宾馆开会，解决晋东南派性对立问题。参加此会的省核心小组成员有刘格平、袁振、陈永贵、新来山西的69军政委曹中南、昔阳干部张怀英等。开会开到半夜，众人口干舌燥，面对程首创与武天明一对矛盾，难题还是难题。正当武天明发言谈到两派斗争的复杂性时，陈永贵突然打断他，发了话：

“你不要这个那个的，王尚志到底怎么死的？你们当时把王尚志突然从襄垣会上叫回长治，说有事嘛，回去连个人也找不见，跟随他的人也换掉了，明明是敌人害死的嘛，偏要说成自杀！”他使用了“敌人”一词，转而问询李顺达，“老李，依你说哩？”

李顺达出于善良百姓的直觉，毫不含糊地回答：“明明就是被害嘛！”他虽然站在联字号立场，却始终同情王尚志。出事前，他刚刚和王尚志在襄垣学毛著讲用会上分了手，老李说：“在襄垣会上人活得好好的嘛！”王尚志当时还对李顺达说过：我愿意接受群众的批判，就是不要先扣那么多帽子，咱们革命了一辈子，咋会反党？咋会反毛主席！二人依依话别。不料想王尚志前脚返长治，造反派后脚就来到襄垣批判王尚志，大字报大标语贴到了李顺达眼皮子跟前，还让他揭批王尚志大会讲话的最新反动言行。李顺达为王尚志打抱不平，他愤怒地说：人家

说甚来？人家号召学毛著，哪句是反动话！——几天后，惊闻王尚志死讯，李顺达曾经当着人面，悲愤落泪。所以此刻陈永贵一表态，他马上表示赞同：明明就是被害嘛。

对王尚志之死，陈李二人结论一致，而判断事物的出发点却很不相同。接下来，武天明开始汇报可能属于自杀的案情，陈永贵的昔阳老搭当张怀英便打断他，提醒武天明：

“你阶级阵线清楚不清楚？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没有？薄一波在晋东南时间很长，卫恒是在晋东南起家的，王谦是在晋东南起家的，王大任也是晋东南的，全云是卫恒派到晋东南的！”

陈永贵当即点题：“全云去了不几天，王尚志同志就被害了嘛！”

你看看，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判断，新贵们认为，王尚志无疑是“老走资派”这伙敌人给害死的。

李顺达愕然，他怎么也想不到“老干部害死老干部”这一层上。同是全国著名劳模，在大风大浪中，老李比老陈的阶级斗争观念显然差多了。

再来看看老干部们的立场。刘开基，山西省副省长，周恩来坚定地保他，几次敦促刘格平等入释放刘开基。1968年6月，刘开基带病获释。其他老干部仍在关押中。刚出狱，这位赤胆忠心的刘开基不顾病痛，冒着风险打发他的儿子刘继英，去寻找给王尚志做过法医解剖的专家王克峰，请王来家谈话。而王克峰的处境也同样艰难，在他分别给死去的王尚志和惨死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做了法医解剖后，不同立场的人为了恫吓威胁他，多次揪斗他，甚至在夜间向王克峰家中投下了炸弹，王幸免于难。各派力量都要从王克峰口中得到各自需要的结论，斗争真是太残酷了。

王克峰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他沉痛地回忆说，刘开基带病获释，全家被赶到省委后边两间小破屋中栖身。“在一个傍晚掌灯时分，他孩子继英找到我家，告知他爸回来了，要见我。我去时巧遇两件事。一是遇到一位已经站出来的‘领导同志’，正在劝勉刘开基要认清时势，坚决站在造反夺权的刘格平一边，引发了刘开基勃然大怒，他毫不客气地追问说：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重说一遍！什么站在谁谁谁的名下？这算何种道理？如果我明天也树起刘开基造反兵团的大旗，是不是也能聚众推波？共产党员能这样干吗？我知道你，你这个人不但自己会投机，还要唆使别人也去投机。你们如果不让我干工作，我宁愿再回看守所！——当时刘开基的颜面和手脚都浮肿得厉害。

“这是一件事。这一幕还没过去，想不到卫恒同志的妻妹张坤萍进来了。有外人在，家人担心引出新麻烦，急示意坤萍快躲走。坤萍转身刚刚迈出门坎，病中的刘开基猛然从床上起来，站在地上，大喝一声：坤萍回来不要走！他当着那位‘领导’的面说：怕什么！回去告诉你姐姐，保重身体，把娃儿们照护好，卫恒不是反革命，不要惧怕他们！老卫虽然死了，要相信事情总会水落石出！坤萍闻言，挥泪而去，刘开基两眼也涌出了老泪，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我深受感动。真是疾风识劲草，坂荡识诚臣。

“刘开基找我，包括住院病中几次约我谈话，是要我坚强，要我顶住压力，不要做违心的事。因为卫恒和王尚志出了事，死亡原因不明，都是由我主刀完成的病理解剖，他得知我各方面压力很大，人家不仅批斗我，还往家里扔炸弹。他深恐我经不起风险和压力，做出不切实际的诊断和证据。他再三叮嘱我，不要弯腰，不要惧怕，要无私无畏，要尊重客观事实。一定要把病理解剖的证据保存好，将来向人民如实做出报告。刘开基同志在极端危难的时刻，对我的点拨、关怀和教诲，是我从逆境奔向坦途的路标和灯火！”

——这是主刀法医的回忆。

刘开基真是一条山西好汉。刘开基的立场代表当时绝大多数老干部的认识：卫恒书记和王尚志，都是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被造反派害死的。——真是立场观点不同，结论也各不相同。

这位法医专家王克峰，后来在北京公安大学做教授。他不负重托，终于在十几年后协助组织和政府，通过多方面努力，对这两起死亡事件，做出了科学的结论：卫恒，在连绵不断的批斗审讯摧残中，因“急性出血性胰坏死，引起严重休克而死亡”，死亡地点在太原迎新街，杨承效指挥下的造反“决死纵队”囚牢中。

王尚志之死同样有了符合事实的结论。

### 失踪前曾被揪斗

王尚志的家，住在晋东南地委天主教堂大院。不在纵深里头，而在大门口头一排，是大院出入必经之路，往来者最多，造反派来大院提人，也必须从这里过。我们找同学王权玩狗，亦常在此地——王权就是王尚志的小儿子。

文革前，地委干部们从书记以下都好打猎，当他们无暇远足时，就提着小口径步枪在这里打鸟，也算过过枪瘾。我老爸曾一枪串打下来两只大黑鸟，当时是小小的佳话。坐汽车去太原开会，便走一路打一路，听说打得最好的选手是第二书记全云和著名劳模李顺达。为何全、李二人这一路上打的东西多？我父亲说，他俩坐专车去太原开会多，对地形熟悉，所以野鸡、兔子蹲在路上等人哩！他们打着了野味，认为是保护粮食除山害，到了太原迎泽宾馆，交给厨房一收拾，还可以改善伙食。——就在天主教堂大院门口，文革前夕，某次，全云从太原开会回来，卸下东西，吉普车开走了，他提着一杆双筒猎枪在此歇脚，地上放着一只巨大的猫头鹰，居然是雪白雪白的。我和王权一伙儿上去围观，惊讶地发现这鹰还没有完全死去，弹粒打入了体内，浑身无血迹，鹰头如狗头，巨目炯炯如电。印象深刻，至今难忘。记得王权还说，我们家在内蒙时，打的全是黄羊和狼，用卡车拉。我就说太行山里也能打到狼，狼肉不好吃，没人稀罕。

就是这么一个地理位置，王尚志失踪那天傍晚，许多人都看到，潞安中学红卫兵，连推带搡，把这位大个头书记从家里抓走了。

这排平房头一家，住着那时人在中年的作家韩文洲，文革前被誉为赵树理的好学生。2004年春季我在山西作协采访他，韩老记忆犹新，说那天他亲眼看到一伙人来院里抓人：天傍黑时，恶凶凶地带走了王书记。我为什么记忆深呢？是

因为文革初，最早在专区礼堂批斗的是作家赵树理，捎带有我，我们想不通。迫于北京的压力，当时省里批判王中青，地区批判赵树理，王尚志按照统一部署，还写出了批判老赵的大字报。这也是山西省委没办法的办法吧！群众瞎批，只好找党。因为和王书记家住在同一排，我曾经引着老赵上王书记家倾诉苦恼，寻求安慰和保护。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更大灾难还在后头，地委书记也难逃劫祸。所以我和老赵找到他家时，他也毫无办法，甚至痛苦地打断我们，说你们现在啥也不用多讲啦，现在只有多检查多交待自己的问题，我也没有救你们的办法！当时我和老赵还觉得，和这位新来的书记不熟悉，什么也说不通。不几天，我明白了，这运动太邪门太可怕，党的各级干部人人自身难保，这不是，造反派冲闹到他家来了，又推又骂，比对待我们还要凶，所以我记得深。那天抓他走，说是连夜要他回答问题，“拼刺刀”。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傍黑把人弄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再往后，老赵被揪回太原，也被斗死了……

韩文洲老师所述抓走王尚志这一天，是1966年12月21日。这一幕我们一伙儿少年人均未见到。但是有一个少年见到了，他就是韩文洲的儿子，友谊小学我妹妹同班同学韩征天——2003年任《长治晚报》总编辑。韩征天对我回忆说：王尚志书记被揪走那天傍晚，我们家正要吃“和子饭”，院子里乱哄哄的，我跑出门外，看见王尚志书记被人连推带拉，无奈地往院外走，忽然，他站住不动了，我和我爸一看，从院门外，迎面走过来一个年轻红卫兵，打着背包，步伐坚定的样子。他正是王书记家的二儿子，就是王权他二哥，叫啥名来着？他从外头走革命长征，大串联回来了。父子俩突然相见，站在那里碰了个照面，谁也不知该说啥好，王尚志书记想说啥又没说出来，潞中造反派催走声声急，父子二人默默地相望，擦肩而过，就一辈子分手了！

大家都知道，王权和他妹，是王尚志与新民夫妇亲生的，王权算老三，往上老大老二，都是王尚志在战争年代收养的烈士孤儿，方才碰到串联归来风尘仆仆的老二，就是他老战友的遗孤。

当时父子俩难中相见，能说什么呢？年少者要革命要造反，年迈者在挨批在受罪，这真是革命人生惨烈一幕。

大夺权前夕，造反派们斗争王尚志、仝云、张行夫、王景生等领导干部，相当频繁。有时候，造反派们自家在场上吵得一塌糊涂，下不来台，竟然还要“走资派”们站出来说：好啦好啦，不要吵啦，都是革命小将嘛，听毛主席的话，咱赶明儿接着来，看有什么要报销的条子，我现在给你们批一下！

王尚志和仝云们，这些天就处在压力重重却体制犹在的状态中。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天兵天将，只能正确对待。你让去哪里，咱便去哪里。最常去的批斗地点是地区大礼堂、红卫兵接待站、地委大楼一楼东头一间大号办公室、地委五楼总会议室、地委大楼门前平台等处。——这不，又把王尚志揪到大礼堂去，连晚饭也没吃。

据长治老牌红卫兵周军等人回忆，最早面对面斗争地市委领导的造反组织，最多就是医专文革、潞中红卫兵、太行反到底、一中北京公社，然后是二中井冈

山、加上师范、农校、火星中学等等，范围离不开地委、市委这一片儿，上街还不多。到夺权以后，才把残酷斗争扩大到游街、扩大到英雄广场，扩大到社会各界，扩大到工矿企业，扩大到全区 17 个县市。把老干部们关在看守所，随斗随揪。

这一晚，周军等人从家里揪走了王尚志，照例没有走远。先在大礼堂，批到半夜，又转至地委一楼东头大办公室，主攻以潞中红卫兵为主，让王尚志、仝云回答问题。反过来调过去，是要否定文革前期工作组，给受压的造反师生平反。上边提到的几所学校几个组织，曾被地委派出的工作组压制过。

让王尚志回答各种问题，除了直接吆喝直接问，凡挤不上去的人，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疑问写在纸条上，递上去令其回答。这样的条子，每一次批斗，王尚志等人都能收到一大把，末了，王尚志们自己收走。这一晚也同样，各类字条一大堆，上面写啥的都有，其中少不了怀疑王尚志是叛徒，是暗藏的反革命，怀疑历史不清等内容。这是当时的“觉悟”与时髦，因为“刘少奇一帮人都在历史上叛党，然后窃取党的大权”，如“六十一个叛徒案”等等。

王尚志死后，在他的办公桌抽斗里，留有这类胡乱置疑的纸条，他留下来，说明他重视。而潞中红卫兵周军等人，并不以为然。周军在潞中是与高太生对立的学生领袖，是个急烈性子，根红苗正，一心一意要闹革命，赤胆忠心爱毛主席。偏偏工作组处处限制他和他的同伴，很不顺心。到第三次和第七次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他冲破阻力到达北京，在二里地以外遥望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身影，算是被领袖接见了两次。很不容易呢。

周军等人则可以解释：我们受压，我们不服，我们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才见到伟大领袖，我们命运惟一支撑点，就是有毛主席的支持和爱护。不是我们崇拜他老人家，而是惟有毛主席才理解我们要革命的一颗受屈的心。许许多多的战友，是强扒火车或者跋山涉水一步一步走到北京，才见到毛主席的，处境不一样，心情特激动……

周军生一副娃娃脸，却是个发育良好的大个子，特像当年标准的红卫兵形象。旧军装一穿，宣传画似的革命小将。

这班革命小将，四处寻觅敌人何在，递条子怀疑任何一个老革命曾是叛徒，或是特务，就不奇怪。

## 黑暗的历史怪圈

而王尚志等山西老干部，情况却很不同。当年参加革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山西地面属阎锡山统领，推翻帝制，开办新学，组建新军，保晋保国，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当时是代表全省人民的新政府，代表新生的进步的历史方向，高君宇、石评梅、彭真、李雪峰、薄一波、高长虹、赵树理、卫恒、安子文，甚至中共元帅徐向前，数不胜数，哪个不是从阎锡山的新学新军走出来的？抗战中，阎锡山是响当当的中国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率万马千军，在国共合作前提下指挥抗日，连林彪的平型关大捷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的建立，包括“牺盟



会”和抗日决死纵队的崛起，都是在二战区麾下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事情。是整个山西抗敌前线对日作战的组成部分。贺龙部一二〇师，聂荣臻部一一五师，刘伯承部一二九师，都是二战区正规序列。山西青年在抗战中为全民族用躯体筑成了血肉长城，威震敌胆。共产党、国民党八年抗战，誓不退过黄河，人民不靠政府靠什么？脱离历史条件大谈谁谁参加过“国民党阎匪军”，大谈“叛徒特务”，脱离历史常识，又是多么无知，多么让人悲伤。正如著有长篇小说《太行风云》的老作家刘江先生所说，在山西抗战前后，敌我之间，阎我之间，往往是犬牙交错，纵横驰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联合又斗争，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如今文革，“档案被抢，干部个人历史完全公开。从旧中国过来的志士仁人，哪个党员的道路不坎坷？哪个革命者的命运不乖蹇？一刹时，山西境内抓叛徒的到处冲，历史反革命何其多！这一手干得够促狭。好多领导人，曾出生入死于敌人监牢，史实朗朗，早已结论在案，文革中谁管这些？只要你沾个边，特务、叛徒、变节分子的大帽子那算戴定了。”——你找谁证明去？连证明你的人也是被整待杀的人呀。

这些天来，王尚志就陷入了这样黑暗的怪圈。山西抗战中，日寇首先占领和巩固的地段，正是王尚志的家乡，太原以北长城脚下雁北地区广大土地。敌寇力量相对强大，抗战力量相对薄弱。他的故乡在平鲁，周边朔县、宁武、原平、阳高、天镇、大同，到处是焦土瓦砾，血流成河。“不到一万人的宁武城，被日军杀了4800人，朔县屠城三日，数千尸体填满了护城壕；日军施行了灭绝人性的毒气战、细菌战，还在晋东北地区，制造了宽近40里，长达1000多里的无人区”，雁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至为残酷。

王尚志既是雁北地区有名的抗日英雄，则在文革前应有记载，文革造反派包括《风雷》战斗队的大字报污他是叛徒特务，虽不可信，但真相又是怎样的呢？此次写作前，我曾留意当地抗战史料，未获。后来查得一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山西抗日群英谱》，由山西史志研究院汇集多年旧文章选编而成，王尚志作为山西第一流健儿入选其中。细察文尾，提到调他任“绥远集宁军分区副政委兼集宁地委书记，后任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盟委第一书记”为止，便知此文写在文革以前。作者尹建勋。文中谈到王尚志英雄虎胆，列举多项抗敌故事，讲到“敌人对他恨得要死，几次捉拿，他凭着果断顽强和各地群众的掩护，都一次次脱险”，“敌伪军一说起王尚志，都说他有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本领，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王’，王尚志成为山朔一带传奇式的抗敌人物”。但是文中提到另外两件事，最终成了造反派们整他并使他难以解释的根由，也最终夺了他的命。

一件事，请看书中原文：

“1940年冬，中共雁北地委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决定派王尚志和陈华二同志到朔县城，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王尚志在杏园敌据点，为我方收集敌人的一些情况。不久，八路军攻打杏园据点，引起了敌人怀疑，随之把王尚志带回朔县，进行了审讯。但王尚志非常镇定，敌人虽怀疑他，但得不到真凭实据。当敌人又要下令逮捕他时，他已悄悄地出城回到平鲁西山抗日根据地”。——这件事，

组织上清清楚楚，备案有据，却很容易被造反派纠缠，上纲上线。所以王尚志在去世前不久，曾担心地向他的同事、第二书记全云咨询：“为了革命任务，隐蔽在敌人宪兵队工作算不算问题？”全云不在意地说：“做敌工工作，可以，做党政工作不行。”全云转而问他指谁，他支吾道：我母亲曾在敌方做过地下工作。这是他失踪四天前的对话。

第二件事就更麻烦了。1944年冬，“大汉奸吴贵被我骑兵队捉住带回西山根据地。吴贵见到王尚志急忙磕头哀求：老同学，快救救我吧，我当汉奸是没办法，是被逼的，今后我一定重新做人……王尚志看看这个高小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本该惩办，但根据当时的形势，还是要争取他们早日反正。……王尚志义正辞严的一番话，使吴贵好久抬不起头来，当听说要放他时，顿足捶胸发了誓言，表示一定改，回去为八路军做工作，并要求联系方法。

“王尚志考虑了一会儿，交待他：你真正回心转意，要做好事，可以和北岭上的李通联系，他会替你想办法的。”

我想到电影《小兵张嘎》里，金保叔不是把胖翻译也放回去了吗？还动员嘎子把那支“真正的撸子”手枪还给这汉奸，让嘎子生了气，堵胖墩家的烟筒，又关了他禁闭……此类事儿在抗战时期应是常见的。

却不料，王尚志轻信了这位老同学吴贵，汉奸吴贵也不是可以改造好的艺术形象胖翻译。这个汉奸返回杨树坡据点后，把王尚志告诉他的地下党员联系人李通，密报了日军，李通因此被捕遇害。

当时，愤怒的王尚志要为战友报仇。“王尚志听到这个悲痛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后悔自己看错了人。从此，王尚志决计要除掉这个可耻的汉奸”。原文接下来写道：

“1945年8月9日，王尚志得到可靠情报，汉奸吴贵要到朔县去，第二天将在砖井村亲戚家吃午饭。王尚志即带领一名警卫潜入砖井一带。……（先处理了吴的随从）吴贵正在炕上抽大烟，枪扔在一边，王尚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房中，缴了吴贵的枪。……王尚志把大手一伸，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吴贵从炕上抓起来，一直拖到大门外的照壁跟前，只听叭的一声枪响，一股污血从吴贵的脑袋里喷出。这个民族的败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王尚志从容地骑上吴的大白马，出了砖井村，和警卫回到了西山根据地”。斯时，王尚志先后担任朔县、山怀县县委书记、游击大队和支队政委。

就是这么两件在民众中传为佳话的抗日战争故事，多年前就有过正面记载，现在到了造反派嘴里，却变成了相反的性质，完完全全走了样，让人有口莫辩。请看第一件事，在文革材料上被写成这样：

“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间，我雁北地区抗日战争处在存亡危急的紧要关头。隐瞒历史混入我抗日阵营的政治奸商王尚志早已吓破了胆。因此趁组织上派他以百姓身份打入朔县特务机关长期做伪‘兴亚团’工作的机会，公开叛党投敌……堕落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

第二件事变异得更离谱：

“就是这样一个大叛徒，……专门接受了日本主子的训练，作为一颗定时炸弹，再次混入我革命阵营，进行间谍活动。……有意将知道他投敌历史的我方地下交通员李通同志，暴露给日本宪兵队队长和铁杆汉奸吴贵，使李通同志惨遭杀害！当时上级党组织就此事查得很紧，王为了灭口，又将吴贵私自用枪打死。”

——造反派的材料还煞有介事地注明此事“见证明材料附八、附九”，待翻开附八、附九一看，证明人只是极客观很正面地写到记得有过这么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评价和自我判断。附八任佐成、附九王万顺的证明材料都十分简略，如附八写到：“吴贵带队伍到西山，出发时被王尚志捉住，还有曹四。当时把吴贵放回，王尚志叫吴贵回去好好工作，和李通商量好通讯办法。但是吴贵放回后，把李通扣去枪毙了。后来王尚志在砖井把吴贵捉住打死了”。——总共就这么几句话，按手印，完了。附九说，“上述情况全是事实，我绝对负责”，按手印，完了。人家根本就没写别的，不带任何倾向性，更没有说王是叛徒。而造反派“改编”的材料，黑白颠倒，矛盾百出，凭空想象，血口喷人：“大叛徒”先是“公开投敌”，然后“专门接受了日本主子训练，作为一颗定时炸弹，再次混入我革命阵营”，“有意暴露”我方同志给日本宪兵队队长，“当时上级党组织就此事查的很紧”，“为了灭口”，王“私自”打死汉奸——整个逻辑都不通。一个县游击大队指挥员，打死汉奸叫“私自”吗？定时炸弹要到啥时候才爆炸呢？

文化大革命，全国自杀者千百万人，令后一代人难以理解，多看看此类材料，就不难理解了。当年出生入死喋血建功的英雄故事，现在成了这般模样。

叹威震敌胆一代英雄，日本人杀他杀不了，他没有死在敌寇屠刀之下，却死在了和平年代我们同胞的“运动”中。这两年民众纪念抗战胜利，重新声讨法西斯，同胞们，不要空洞地喊爱国主义口号，那样无济于事，大家想过没有，我们自身，就要敢于检讨我们民族自身问题，杜绝历史悲剧的重演，才能最终战胜一切犯我之敌。

文革运动，替日本鬼子杀了王尚志。

文革运动，灭杀了数不清的民族精英。这里不妨再次剖看另一个悲惨的例子：人民作家赵树理同样死于山西文革，冤深似海。最早批斗他，就在晋东南。除了许多强加于他头上的“罪恶”外，还有一个内情，更令人心痛。1958年，赵树理在晋城、阳城挂职深入生活，任县委副书记。出于对党的忠诚老实，毫无隐瞒地填具了一份《干部简历表》，在《个人认为历史上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中，赵树理诚意地写道：

1928年（注：赵树理刚20岁出头），山西省立第四师范（设长治）党组织被破坏，有两位同志被捕，四五位同志逃亡。有一天，同学王春同志（阳城人）要我同他逃跑。……我父亲是中医，自己在没有医生时候也能治些平常小病，所以他要我和他去装野大夫。临行时候，他给阎锡山上书说是“误入歧途”，并说“今后要当好国民”等语。书后并具有我的名字。他说这样做了，万一被捕也无大碍。他比我高两年级，有才名。我对他是一切听命的。1942年在太行整风时候，我和他同在新华书店。我向党详细谈出这段过程，并和他当面订正。他承认

说当时他回到阳城后，有人告他说在阎的秘书处发现这封信，认为对他不利，就把信扣下了，未向上转。整风小组认为无论此信起作用否，都是反党行为，但应由他负责。1956年（中国）作协审干办公室认为即使是被人拖下水，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实际上连我前次入党也是被他用拉夫式作法替我决定的，入党后，离校前的思想水平始终没有超过他，以为他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他本人已故，没有留下足以说明这事的材料，作协尚按常理判断，应该说我也有责任。

赵树理 1958年7月

凡赵树理研究界尽知，王春是山西上党地区一名早期共产党员，立场坚定，是赵树理从多年彷徨中走向革命的引路人。战乱之中，上书省府掩护自己，何况还是个学生，无非是为了“万一被捕也无大碍”，此信亦无任何作用与后果，阎锡山根本没有见到。但从1946年到1956年，党组织均认定此事为反党行为，赵树理本人也有责任。到了文革，这种事情更了不得！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作家，硬是被无情地整死了。他没有躲过这场劫难，尽管他乐观豁达从未选择自杀。

王尚志“案情”与“罪行”比王春写信自要严重得多。——我党地下交通员，由于他的“有意暴露”，被日寇、汉奸杀害了……

回到前面的故事中来。

1966年12月2日下午，王尚志在巨大压力下，代表地委，向造反派作了一个关于地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万言检讨。应该说，这次检讨是依据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迫所作检讨，套用的一个“翻版”。老干部们是不甘心真正向造反派们低头认罪的，专员张行夫把王尚志这次公开检讨，仍然说成是“王尚志同志作报告”，因而也遭到了红卫兵、造反派们的强烈批判。地委和行署机关的“文化革命小组全体革命群众”和“第三支部”的造反派们，针对王尚志的《检讨》，写出了一份长达几千字的讨伐式大字报，除广泛张贴外，还正式印刷成了布告型的大张传单，到处传播，煽风点火。从12月7日以后，这张《评王尚志代表地委的检讨》的大字报和印刷品，成为当时打击地委的炮弹和整个运动的焦点。

应该说，这份文告的公开，对于王尚志的精神打击相当大。

这份大字报称：王尚志的检讨，是“欺骗群众，糊弄群众的一个阴谋”，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更大错误”。称王尚志的检讨，是“一锅煮，不敢把自己摆进去、亮出来，不敢真正触及灵魂”，“一个人每做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思想活动过程，都有一定的动机和目的，地委领导也不会例外”。大字报要求王尚志揭发全云等其他领导者，同时，“要做进一步的深刻检查，要敢于触及灵魂，敢于谈具体事实，敢于交待真实的思想活动过程和原来的动机目的”，特别是在该大字报的最后，造反派们强烈要求“成立一个专案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把前段运动的简报文件仔细地审查一遍，把问题全部公布于众，让群众彻底批判和清算”，要追查王尚志、全

云等地委领导的“根子”问题，“清算罪行”。

这张大字报被地委干部们广为传阅。

王尚志、仝云和专员张行夫等老革命，遇到了他们自走上革命道路和担任领导职责以来最大的难题。他们一向有着紧紧依靠上级党组织而工作的传统，可现在，举目北望，省委组织同样遇到了比他们更大的难题，省委领导、华北局领导，一个个自身历史坎坷复杂，人人自顾不暇。眼下屡被冲击批斗，东躲西藏，人人自危。得不到指示，见不到光明。从省委到地委，个个都在打倒之列。王尚志的精神支柱正在崩塌。

红卫兵精力旺盛，全社会如火如荼，满目狂暴。

造反派步步紧逼，本机关颠倒是非，势成累卵。

当前，所谓错误严重，高压来自中央。

从前，历史误区甚多，真情有口难辩。

这不，到了12月20日傍晚，王尚志在家中晚饭都没有吃成，就又被“医专文革”和“潞中红卫兵”等造反派们揪出了家门。这将是他的呼嘯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

这天晚上，王尚志已是疲惫不堪。又是一个争吵不休的辩论会。据观点不同的老红卫兵潞中周军、医专郭天聪，还有一中、二中等多位老红卫兵们回忆，那时候造反，本来是让地市委领导回答问题，批着批着，红卫兵两派之间，就吵了起来，忽儿，红卫兵又众口一词奋起围攻老干部，场面更让人尴尬。

这一晚，在11时前后，王尚志曾经暂离会场，回到地委大楼，接了一个来自省委的电话，被告知形势将更加严峻，地委仍要继续检讨下去。此后，王尚志重新回到会场接受批判。而后，全体从地区大礼堂辩论会转到地委大楼一楼东头大办公室质问会。而王尚志自己的办公室则安在地委三楼，有简单的床铺，忙时可以在此过夜。

夜深散场时，已是21日凌晨3点多了。王尚志在质问会上心灰意懒，直打瞌睡，即由潞中周军等人送王尚志上楼。仝云则留在会场继续回答质问。到二楼口，王说不用送我了。周军等人也没多想，掉头出得楼来，七嘴八舌间，过了马路，百十米不到，回了西招待所红卫兵接待站睡觉。他们这些日子常住这儿。

王尚志精疲力竭，万念俱灭，再不愿意奉陪这场运动。

此后一两日，谁也未见王书记。仝云、张行夫等首脑很自然地认为是被造反派揪走了。派下属们正常寻找，仍未见王，问谁谁都不知道，这才急了。领导们跟造反派打过交道，别的干部真还不熟，只好亲自去问去找。周军回忆说：大概是第三天早晨，专员张行夫来到我的床前，拧着我的耳朵叫我起床，我迷迷糊糊醒来，张行夫直接就问：小鬼，把王书记搞到哪里去了？——我哪里知道？那天晚上他回到三楼去了吧。

医专郭天聪回忆：地委来了一位秘书长，找我问，王书记在这里吗？找另一派头头梁权也问了，双方都说肯定没有来过。秘书长急了，他说已经问了太行中学和潞中红卫兵，谁都说没见。秘书长沉思了一下，当场在我这里动笔写了一份

《寻人启事，十万火急》就近到地区印刷厂去大量印行。并让我们各组织都出动寻找。

寻找范围扩大，寻找人员增加。再扩大，再增加。

惊动了全市百姓，惊动了省委卫恒、王谦。

地区公安处和长治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昼夜不停。地、市两级名探全体上阵，搜集查证线索，分片包干排查。

### 名探出马

长治市里有两位名探，一叫关双锁，一叫王双锁，脾气性格都相仿。饱经沧桑，双具慧眼，做事稳当。不但名字相似，而且阅历相同，一个当刑警队长，一个当治安科长，文革一来，观点也相同，你不参加联字号，我也不参加红字号，咱俩就是“双锁号”，看透了这世道的可怕，保持老警察既冷淡又热情的爱民形象，拒不参加两派组织，怕受伤。到了谈恋爱时候，你谈姐姐，我谈妹妹，要结婚咱俩相跟上，还真成为“一条杠”。二人平静地看待文革到来，平静地看待文革结束，俩人心里明镜儿似的，两颗心合成一本账。一般坏人你别惹我们俩，特殊坏人我俩也不惹你。果然到了文革后，死的死，伤的伤，二锁双双都无恙。二人没讨便宜，二人也没吃亏。年龄大的时候，二人双双提拔，二人又双双退休，二人啥事儿都一样。锁到一块儿了。本市半个世纪以来的案子，全在俩人肚里装着。

为了王尚志等几道长治文革案子，我特地采访了长治两位名探。这两位的人生故事真是奇而又奇，我纪实采访这么多年，还从未听说有如此奇特并非同胞的一对弟兄。这不，我先是采访关双锁老人，他马上提议：叫王双锁也过来，俺俩在一块儿才能想起事儿来，说话儿才能准确。我闻言自然高兴，人说你找到一个锁，就等于找到俩锁，真是经验之谈。此时，70多岁的关双锁给70多岁的王双锁拨通电话，没有任何废话，只轻声嘟囔了两个字“来呗”。刨掉语气助词，其实只说了一个“来”字，就把电话放下了。两位高级捕快默契到这般程度。不足10分钟，王双锁到。

关王双锁——往后凡提到他俩就这么写——同时出面协助了我的工作。我不想说“接受了我的采访”，只想感谢二人协助了我的工作。

寻找王尚志行动全面铺开，关王双锁包片的重点段正是南关。南关村干部王正其带一小组积极配合。12月27日上午，王正其小组成员张继国、常小文首先发现重大线索：用镜子反射机耕深井，发现王尚志人在井下，头朝东北，脚朝西南，躺在水底。这一发现距失踪之日已经一周。

由地市公安局紧急制定并实施打捞方案。先接电用泵抽水，往农田排水。

地市主要领导亲临现场，仝云，张行夫含泪无语。

几大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也到现场。

别人闹哄哄大忙大乱，关王双锁一丝不乱，只顾一心一意在南关上下查找线索。二人说，我们专门找黑夜不想睡觉的，一大早偏要起身的人，在他们当中寻

找目击者。很简单，这案子不可能发生在大白天，你找一万个人问，他说自己逛街，你不会有发现。

抽水、排水，水落尸出。12月27日下午八时井水排完后，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林矗亲自下井打捞。在强光照射下，人们看到：王尚志身上用床单捆负着大堆砖头石块，重量惊人，竟达74斤3两。案情轰动省地市。

第一手侦勘记录是破案的根本。地市公安局指挥关王双锁们查验、记录，完全做到了周密、细致、准确。丢失的惟一指标，是没有采集到现场足印。四面八方的群众在第一时间就踩遍了现场田野。

关王双锁和干警们默默地寻找目击者，有了一大收获，是在一个最平常最不起眼的人身上，找到了一条极重要的证据：长治市制棉社普通职工李计则，惟一的爱好是绝早起来跑步锻炼，他证实：12月21日晨5时35分，他跑步经过大南关，看见马路西侧土堆前，面朝东站着一个人，高个子，穿黑衣，戴火车头棉帽，正在往地面上铺撑大块白色包单。引起他注意，但未停留。当他跑返程回来时，见同一人在同一地点正在把包单收起来，“疙瘩累赘的”很沉。心存疑虑，但仍未停留，李计则跑走了。

这条线索，单一无凭时，并不显珍贵。一经对照衣帽及床单颜色形状，便重要起来。死者入井的床单呈白色，属王尚志办公室床铺上自用床单。衣帽无误。时间5点35分。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

另一批警察查到了另一条证据：地区招待所民兵雷洛祥，同一天被安排在广播电台门口站岗值班。这是地委向东惟一出口。凌晨四时左右，忽见一个大高个子，黑衣，火车头帽，左腋下夹着什么东西，由西向东而去。疑为王尚志本人。这里距南门外好几公里路。前后两线索合并，干警们遂亲自弃车步行验证，一路掐表走去，到上一条线索捡石块地段，正是那个时间长度。穿戴及身高与二目击者所述吻合。这两条线索结合对照，就极珍贵了。同时，这一切，又与王尚志本人失踪时间、穿戴身高、事发地点，身负物品完全吻合。

床单捆在腰间，挽成死疙瘩，名探们用双手试验自挽，与死者身上床单疙瘩的走向、扭结相同，可认作自挽。而非他人强行挽成。

现场勘察结果：死者衣帽鞋袜穿戴整齐；左腕上手表完好，表壳表带与皮肤压痕未错位；全身衣服除外衣第五钮扣缺损外，余皆完好，未见任何撕损毁坏之处。

井内打捞，无其它凶器。

地市公安干警在专家指导下，把以上勘察诸项做得很细致，记录详实，程序严谨。——关王双锁至今仍讲述得很有条理。据他们从经验上分析，此案已接近自杀而非他杀。

但仅仅这样仍不敢冒然结论，还要掌握更科学的“硬件”。以下工作就不再是关王双锁他俩的职责了。

省级法验专家，如王克峰等，率地市高级法医包括长治外科专家马永泰等，分三次进行尸体体表检验，认定：死者皮肤完好，“除发现数处‘羊皮纸样化’

尸体正常变化外，未发现任何异常现象和他杀迹象”。

经省级防疫专门机构化验，死者胃内物、尿液及肾脏等未发现异常，“氰化物、生物碱、巴比土、砷、汞、锑、锌等毒物均未检出，证明非中毒死亡。”此项化验随即送上海检察院法医检验所进行再次查验，结果相同无分歧。进一步交上海验察的内容还有井水，其它多项组织切片等，结果是“未见各项毒物中毒现象；全身无生前外来暴力性损伤；死者患有轻度慢性炎症。有窒息、皮肤接触冷水、肺增大及浸水现象”，因而“认定死者系淹死，排除暴力性损伤、毒物中毒和急性病变等”。——自杀证据充分，他杀难以成立。

除案发初期地市和公安机关组织了上述侦破外，到 1976 年在落实政策期间，地委对王尚志死因再次进行了调研落实。补充查证了王尚志死前确有一些反常表现，一是他曾向地委第二书记全云咨询隐蔽在敌人内部工作算不算问题（前头已经提到过）；二是王和爱人新民在与全云谈话时，曾担忧地问：听说有人到北京串联，还到内蒙和雁北调查我的历史材料”等，这个情况发生在死前两个月；三是到了 1966 年 12 月 8 日，此时造反派越闹越凶，王尚志曾在深夜给省委赵雨亭打电话说：“告诉省委，我顶不住了，再派个人来吧！”这情况发生在王死前十来天；四是王的爱人新民因身体有病，很少外出，但在王失踪之夜的凌晨 4 时 20 分左右，起身到家属院内外寻找王尚志。“以往王常在办公室休息过夜，她没有找过，说明她心里有事，恐与王那几天表现异常有关”；王曾于死前数天，在家中吃饭时，烦恼间摔过几只碗。五是在王死后，新民闭口不提供王失踪前的任何情况，不提供王的笔记本，也不同意解剖验尸，后匆忙间将王尸装棺运走。——那时，通常会把自杀定为叛党，定为抗拒运动，她是无奈的；六是在王失踪前半夜，11 点钟时，王曾经从地区礼堂辩论会上临时离开，回办公室接省委长途电话，被告知“还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委还要继续检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在北京高层的强压之下没有办法的事。王看不到希望了。

### 十五年后的结论

中共晋东南地委根据以上全部情况，于 1977 年间向省委作出一次正式调查报告，山西省委 1978 年 11 月 21 日作了批复，指出：王尚志同志是一位好同志，虽系自杀，却属于受迫害致死。并指示对其遗属生活等问题作妥善处理。地委根据省委批复精神，为王尚志同志举行了追悼会，明确了“因受‘四人帮’迫害而致死”。追悼会上没有向社会公布自杀情节。

到 1981 年 9 月，中共晋东南地委根据指示再次向省委作出《关于王尚志同志死因等问题的复查报告》，最终结论如下：

根据省委办公厅来函精神，我们组织了有地区公、检、法和组织部门参加的调查组，在省公安厅吉振安、省高级人民法院李金元等同志配合下，对王尚志同志的死因等问题再次进行了复查。……这次复查中，调查组详细翻阅了原来的全部案卷和调查材料，查验了当时的出事地点和路线，对有关证明材料进行了复核，并同有关证人举行了座谈。一致认为，原来地委和公安机关对王尚志案件的调查



工作是下了功夫的，勘测、检验和侦破、取证工作都是做得比较细致的，认定王尚志同志不属于他杀的理由和证据也是比较充分的，对王尚志同志死后的善后工作也做了妥善安排。因此，我们的意见是，仍维持原来的结论：王尚志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但不属于他杀，按正常死亡对待。

写到这里，读者已经很清楚了，是残酷的文革运动，逼死了王尚志，逼死了这位深受人民热爱的雁北抗日英雄，但不属于他杀遇害。为了消除人们的派性疑虑，我还要补充告诉读者，当年参与做出以上结论的晋东南、长治市主要政法领导，如老公安处领导白玉山、赵龙吉等人，当初都没有直接参加派性组织，也是受迫害的“走资派”，甚至在当年还多多少少倾向于红字号观点。历史上，红字号坚持认为王尚志被对立面所杀，要为王尚志同志复仇，应视为运动初期客观存在的民众情感大波澜。2004年我多次采访白玉山、赵龙吉、关王双锁这批老公安得知，他们在办案中并没有受到红字号观点的影响，而是尽职尽责，坚持以科学客观态度据实推演结论，终致水落石出。他们一致认为，王尚志确系在深深的绝望中自杀了。这批老公安对我讲述的最感慨的心里话有两句，一句是：文化大革命太可怕，无法无天；另一句是：要实事求是，太难太难了。

从王尚志之死，到地委最后结论，整整15年，到今天，竟已40年了。

对于王尚志的死因，似乎已经把话说完。但是，在充分研究了文革前夕大量史料之后，我还想向读者补充一点特殊的因素：王尚志最终选择自杀，与党内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个人造成的巨大精神孤独，是相关连的。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王尚志处在本土蒙系干部包围之中，各种矛盾差异以及所谓阶级斗争长年不断，中共华北局重点解决自治区蒙汉干部间矛盾冲突好几次，到1964年冬，对内蒙古实行了一套省际干部大换班办法。晋东南地委书记赵军，很不情愿地带一批山西干部到内蒙去，与王尚志对调。1964年12月，王尚志来晋东南做第一书记时，却没有带来任何干部。而晋东南党政两体系中，为实权、为地盘，太行派与太岳派同样是经年累月明争暗斗。王尚志当年在雁北打过天下，如今来到这里，人事竟无一熟悉。大体上说，太行派在中央有李雪峰、陶鲁笏，省以下有王谦、贾俊、王中青、史纪言、张行夫等；太岳派在中央有薄一波、安子文，省以下有卫恒、胡晓琴、刘文山等，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特别是彭真那里，合流为一回事。建国以来，“两山”两派在晋东南或轮流坐庄，当仁不让，或平分秋色，你中有我，他人不要想插手。王尚志来此任第一书记，卫恒随即派来全云为第二书记。全云本来就极能干，又是省委委员，多年的团省委书记，调来时从省里同时带来了几十名贴身干部，很快打开了局面，执掌晋东南实权。王尚志根本动不了干部。他来时正搞四清，便下到县里以至大队，以普通队员身份加入工作队，“连个写简报搞材料的干部都配不齐”。在长子县四清结束，又转到长阳县苏店蹲点。“王尚志讲话，讲稿要经全云审查，结束要由全云来收场。”第一书记，实为空中楼阁。举目晋东南17个县市，新干部都在寻找粗腿，而太岳派时为当权派，太行派亦是实力派，你看该跟谁？反正无人来抱王尚志的腿。地常委开会，决议干部安排或事项，太岳全云不说话定不了，太行张行夫不

点头行不通。对外时，又联合一致看不出分裂来。王尚志从茫茫草原初来乍到，这里群峰叠嶂，沟壑纵横，处势险要，他远离战友与乡亲，有职无权工作展不开，心情自当悲苦，还要维护团结。公平地说，太行派、太岳派都是土生土长老革命，江山是人家打下来的，本乡本土，首长部下，亲切一点儿关照一点儿也不是怪。从实际情况看，并没有发现明里暗里欺负排挤王尚志的过分事例，只是亲热不成，帮派亦不成，免不了生出孤单凄凉无助来。

本地区如此，在上层如何？这位从内蒙草原转战几十年刚刚归省的干部，对省委上层同样不够熟悉。虎落平阳呢。

偏偏，王尚志回省，迎头赶上了四清，赶上了文革，赶上了最不讲人情、最凶狠倒霉的年代。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又向谁人说？

万念俱灭了，人才会漠然走向死亡的暗夜。捡那么多石头捆扎在自己腰间，表示他永远也不想浮出水面，只求永远平静地躺在大地幽深处，不愿让人惊扰。

他当然不会想到，他的死，搅动了太行山巅一场更大更持久的风暴，多年不可平息。

我们深切地悼念他。

---

## 【忆旧思亲】

### 班长周瑞清之死

散淡天涯

按：本篇选自作者博客。

我们的班长周瑞清来自温州，小小个头，眉清目秀，思想进步，性格随和，什么事都是让着别人，班上的事情再繁琐他也毫无怨言地去做，所以人缘特别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小小的南方人竟然比我们北方人更抗冷。刚进北大报到时，他赤脚穿一双旧的黑布鞋，行李特别简单，一个布包，一领草席而已。十冬腊月也没见他穿过棉衣。文革开始后，他满怀对党和毛主席的淳朴深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

1967年8月，文革动乱愈演愈烈，“上面”有人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公开主张“文攻武卫”，武斗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整个社会乱到了无法无天无政府的状态。尤其糟糕的是部队失控，面对明火执仗抢夺枪支弹药的“造反派”不敢开枪阻止，导致大批枪枝弹药流失，武斗从铁棍长矛升级到真枪实弹。周瑞清从温州老乡那里了解到温州武斗的严重态势，当时两派组织持续枪战，死人成堆。最繁华的五马街被糟蹋得只剩下一片瓦砾。老人们都说：过去解放温州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地打仗，因为温州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城区保存得很好。

周瑞清认为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绝非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爱国青年，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财产受损失，更不能让无辜群众流血牺牲。他决定

回温州，用自己的一片诚心和最大努力做两派之间的协调工作，尽量化干戈为玉帛，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的伤亡和国家的损失。

当时同去的还有周瑞清的温州老乡、数学力学系的同学王建新。他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要比别人描述的和他们自己想象的更加惨烈。全市的工人不上班，商场不营业，学校关门，公共交通瘫痪。主要武斗区域的街道筑起了工事，一栋栋大楼变成了碉堡，一个个窗口变成了枪眼。大白天的街上也是空荡荡的不见人影。许多市民到外地投亲靠友避难去了，没有离开的也紧闭大门不敢上街。两派人杀红了眼，建筑物上的枪弹痕迹到处可见，烧毁的房子变成残垣断壁，有的地方甚至被夷为平地。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枪战中死人不计其数，尸体大都草草地葬在城郊的青台山上。有的来不及埋葬就装进麻袋随便扔掉。

两派都已丧失了理智，为了争夺每一条街道和每一栋楼房而厮杀，都想让自己这一派执印掌权，成为当地统治者。因此不仅要攻城略地，而且要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和周瑞清同去的王建新和同一派的几个人外出办事，遭到了对立派的伏击而被俘，王建新被装在一个麻袋里乱棒打死，草草地装进麻袋埋在一个土坑里。

王建新是周瑞清最好的同学和朋友，他们一起从温州考上北大，文革中一起到温州串联。几天前还生龙活虎的一个青年说没就没了！周瑞清欲哭无泪，怎么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当时就想：不行，不能再死人了。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制止这种疯狂的厮杀。

周瑞清拿了一个照相机来到枪战区域，他在街上穿行，在楼上攀爬，冒险拍摄下一个个武斗场面。他知道自己很可能被对方的冷枪打中，但是他只想抓紧时间多拍一些实况照片，好让中央尽快了解这里的情况。

正当他紧张而专心地拍摄时，数枪齐发，周瑞清跌倒在枪声里，顿时鲜血如注，昏迷过去。他的战友冒死把他背出来，送进医院。

周瑞清身上中了两枪，是两种不同型号的枪打的。一枪打在胳膊上，是颗开花弹，胳膊上一大块肌肉被打碎脱落，断骨白森森地露在外面，伤口大得缝都缝不上。另一颗子弹从前面胸颈间打进，穿过脊椎骨从后面出来，神经被打断，造成了高位截瘫。整个人只有双手和头部还有感觉。后来他自己都庆幸，说如果这两颗子弹换个位置，那颗开花弹打在胸颈间，他恐怕当场就牺牲了。

温州方面立刻把王建新牺牲和周瑞清负伤的情况电告了北大，系里得知后，立即派了我们班两名男生到温州去接应。医生说这样严重的伤势，只有送到上海的大医院才有条件得到较好的治疗。两名男生千方百计费尽周折，经过层层审批，终于获得东海舰队司令部的帮助，专门派了一艘小炮艇把周瑞清送到上海，住进了东海舰队的411医院。我们班又派了专人在医院陪护。

过了两个月左右，周瑞清的伤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医生说他的伤病是无法治愈的，就像这样维持着不要恶化就好，最好能转到北京继续做维护治疗，离学

校近，有什么情况好解决。经学校同意，与民航联系获得了支持，9月30日用一架小型运输机将周瑞清和陪护人员送回了北京。

同学们前往机场迎接。终于看到担架从飞机上抬下来，我们立即围了上去。周瑞清面色苍白，颧骨凸出，双眼凹陷，如果事先不知道是他，我们确实难以辨认。薄薄的被单下的身躯，令人感到纸片一样没有重量。打着点滴，身上另外还插了两根管子。他平静地面带微笑叫着我们的名字一一问好。几个女生俯身看着他，全都带着笑容，眼泪却滴到了他的身上。

他住进北大第三医院，安顿在一间敞亮的病房中。回校途中，我们几个女生都一言不发，一想到周瑞清今后所有的日子都要躺在病床度过，而且谁都难以预料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少时日。大家心里都感到异常沉重。

1967年10月到1968年3月，大约有半年多时间，班级排了值班表，同学们轮流到医院陪护周瑞清，女生也不例外。

有一次轮到我值班，一进去就看见他的病床上方挂了一根拉力弹簧，他正在用健康的手握住弹簧锻炼身体。虽然累得满头大汗，还是坚持拉够了30次才休息。我帮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喂他喝了一些凉白开，就开始应他的要求，轻声为他诵读写保尔·柯察金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天读到保尔因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痛苦不能自拔而产生了饮弹自杀的念头，枪口“鄙夷地瞪着保尔的眼睛”，保尔以严峻冷酷的态度谴责自己：“你平时说什么要干出一番英雄事业来，原来全是纸上谈兵……即使到了生活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想办法活下去。”读到一场危机安然度过，我合上书本，看着周瑞清，他会心一笑，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把书要了过去，说一只手拿书，加上下巴辅助，是可以自己看书的。

我后来还去看了他几次，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他说拉弹簧锻炼几天后感觉手臂有劲了，要和我比赛扳手腕，我欣然允诺。但是一握住他那骨瘦如柴微微颤抖的手，我就明白了他绝不是我的对手。但我还是巧妙地制造出一段不分胜负的僵持状态，然后假装力不能敌，顽皮地笑着败下阵来。他也笑了，却说我故意让着他，没有坚持到底。他心里什么都清楚。

第二件事是我和另一个女生顺路去看他，他恰好睡着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枕边。我悄悄地拿起来一翻，在折角的一页看到，恰巧是描写保尔和冬妮娅初恋的情节。我心中生出无限感慨，他和我同岁，1967年我们都刚满20岁。我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初恋，而他却一直沉浸于革命运动，还没有来得及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如今对他来说，爱情恐怕已经成了一种奢侈的梦想。

1968年3月下旬，北大校园里开始了激烈的武斗，周瑞清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后来听男生C说，周瑞清不久就被接回温州老家，由他的父母，还有哥哥和妹妹照顾。

1970年3月中旬，北大所有的在校生被安排提前毕业。为什么是3月毕业离校而不是按学制惯例的7月呢？我们心里的感觉，仿佛被扫地出门似的。曾经同窗共读，也曾经同室操戈的同学一时间风流云散。

等到再次询问周瑞清的消息时，他早已经冷清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后来听他哥哥说，因为家在农村，医疗条件差，周瑞清的伤口几年都未愈合。最后连续高烧，浑身溃烂，转至大医院时已经无法救治。

周瑞清去世后葬在温州城外。他的家乡温州，如今已经走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前列。而牺牲在 20 多岁花季的他，只能躺在冰冷潮湿的坟墓里，静静地观看人世变迁。

## 附记——

我的同窗小 C 近期在班级网站发表了回忆周瑞清的系列帖子，他的回忆文章里关于周瑞清离开北京前后的情况，对我的追忆是个很好的补充。现将有关部分转贴如下：

### 【怀念周瑞清】（节选） 作者：Ctm

1968 年春，学校武斗开始之后，周瑞清的病房也冷清了。同学们各人忙各人的事，少有时间来看他了。他也察觉出来了，却从来没有问过什么。而关于学校武斗的情况我们也没告诉他。我从 40 斋被赶出来后，先住到了 30 斋。原来住的同学走得也匆忙，好多东西都没拿走，其中不少是书，都是很有用的，而且还是新的。但在那“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被书的主人丢弃了，真可惜。我嫌太吵，过一段时间后就搬到地质学院我高中老乡同学的地方。那儿离北医三院比北大近，去一趟也方便。

不幸的是周瑞清的病势日见沉重。他两颊削拢，颧骨突出，眼眶下凹，眼神少光，手臂干瘪，拉力器也拉不大动了。肉疮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周围皮肉青中带黑，护士每天都要剪去一层腐皮，可却长不出新肉来，还滴着脓液。看了真是痛心。医生说这是没有办法的。生命延长多久，全在于护理的程度及病人本人的体质。没有什么特效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周瑞栋（周瑞清之兄）决定带弟弟回温州。那是他的故乡，有众多的亲友。生活也比较方便，可以做一些南方人喜欢吃的东西，调调口味多吃点，增加营养，增强体质。我在同学处不能多待，也准备回老家。北京到温州没有火车，要在上海转轮船才能到达。我一直把周瑞清送到轮船上，俯下身去拉着他的手，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说着要多保重身体。因为谁都知道这一别不知是否还能再相见。我没走几步回过头去，只见他那只尚能动的手还抬起来在摆动。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后来得知他还住在 411 医院，不过不是住在住院部，而是住在门诊部的观察室。

送走周瑞清后我就回宁波老家了，直到武斗结束我才返校。

回到学校后就接受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再教育。经过宣传队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几个月前还互视为仇雠，斗得像乌眼鸡似的人就和好如初了。这官兵和工人果真有那么大能耐使我们消除派性，搞好团结吗？实际上还是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让解放军和工人阶级来管理教育我们，毛主席他

老人家真有办法，确实伟大。

到了1969年冬季，听说为了备战备荒防备苏修挑起战争，学校突然袭击似的，把我们拉到延庆县张山营公社[上]下板泉大队搞教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几个人睡一个炕，一起劳动，打棒子，砍柴火，选种子，挖防空洞，还到打谷场去忆苦思甜。短短三个月时间，我们班同学变成了感情深厚的兄弟姐妹。

我们在下板泉一直待到1970年农历大年三十。毫无知觉更无准备，那天突然来了几辆大卡车。一个命令叫我们整理好行装，上车出发，直接拉回了北大，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

回到学校后没过多少日子就听到有小道消息传出，说我们快要分配了。我开始还不相信，认为我们按规定是70年7月才毕业分配，现在才2月份，我相信党中央不会这样急着将我们扫地出门的。但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被集中在学六食堂的东餐厅开大会[也是曾办过王建新，周瑞清展览会的地方]，工宣队宣布了毕业分配方案，多数同学先被分配到省里，又被安排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大约一年后再分到具体单位。我被分配到浙江象山县，而躺在病床上的周瑞清被直接分配在温州市。

到象山后，县革命委员会分配我到东陈公社南堡学校的带帽子初中任教，我对那个地方感到陌生，孤独之中我思念着曾一起生活过五年的同窗。我给每一位同学写信，寄到同学的老家，幸亏毕业时我要了同学们的家庭地址，才使这条红线不至中断。接着我就一封一封地收到了回信。有时一天有三，四封之多。连邮递员也楞了，因为这种偏僻地方过去很少有信寄进来。

我尤其思念周瑞清，不知后来他怎样了，身体是好转还是恶化。按照他哥哥周瑞栋给我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就收到了周瑞栋的回信，说周瑞清已经逝世。他回温州后病情没有好转，一天比一天差，发起烧来，饭也吃不下了，仅靠输液维持生命，最后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周瑞栋还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周瑞栋带着白花在追悼大会上发言。另一张是在周瑞清坟头上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周瑞栋我是认识的，其中的一位老者应是他的父亲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父亲该是如何悲伤啊！

周瑞清当时是被作为烈士看待的。

1998年我回北大参加百年校庆，同学们相聚时都想到了周瑞清。我回来后又按照老地址给周瑞栋写了信。因为我28年一直没同他联系，所以只能用老地址写。但是这次没有再收到回信。

2000年丹城中学党支部组织党员到温州去参观访问。我也去了，到了当年武斗最激烈，破坏最大的那条街，现在高楼鳞次栉比，热闹非凡，是温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我又打听周瑞清家原来的地址，却没人知道了，温州在旧城改造，大规模的拆建，可能也拆了。周瑞清安葬的青台山就在现在的温州师院上面，坟被平了，烈士待遇也取消了。

周瑞清的信息就如同他的灵魂一样在空中飘摇。我想他如果九泉有知也一定

会想着我们，就如同我们怀念他一样。

周瑞清同学，安息吧！

---

## 【忆旧思亲】

### 母亲的好友穆淑清之死

何 蜀

穆淑清是我母亲的同乡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我们小时候都按四川习惯称呼她穆嬢嬢（川语“嬢嬢”即普通话的“阿姨”。这个“嬢”字读阴平声，与“娘”字的读音声调和意义都不同，不知为什么《现代汉语词典》中要把嬢字淘汰掉，合并到娘字中去）。有关穆嬢嬢的一些事情，都是在她死后多年断断续续听母亲讲的。

母亲和穆淑清都是四川合江县人。穆淑清比我母亲小几岁，她的生父是当时川军部队中的小军官，聪明能干，被上司、川南小军阀穆瀛洲（1949年任川南六县保安副司令时率部起义，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收为义子。她生父战死后，她的母亲带着儿女（穆淑清和她哥哥）改嫁给镇长李仲池，改嫁时，为了不让儿女今后吃亏，她母亲特地将亡夫所遗财产（田产）全部立字据转到儿女名下，以保障儿女今后的生活及读书费用，但收租及管钱仍全由她母亲一手操办。穆淑清因此有钱到重庆读书，从中学读到（私立）大学。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在四川崩溃后，她的继父李仲池因与后来担任四川省省长的老共产党人李大章是叔伯兄弟，得到李大章关照，“主动坦白”好，免遭镇压，被送去新疆劳改。穆淑清则留在重庆参加了新政府办的干部学校（训练班），学习后分配当了小学教员。她继父解除劳改后回到四川，大概通过李大章的关系，在成都安排了工作，并将穆淑清的母亲接去了。



穆淑清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常从经济上接济我母亲。我母亲是贫民家庭出身，40年代初我母亲考上县里的简易师范学校时，家里连一床棉被也拿不出来，还是穆淑清的母亲送了一床被子。后来穆淑清和我母亲都先后到重庆读书了，她在重庆仍继续资助我母亲。50年代，她还经常把她的衣服一包一包拿来给我母亲，说是可以给我们几个小孩子改衣服穿，但我母亲一看都是很好的衣服，哪里舍得改。

50年代前期，穆淑清还常到我家来，十分亲热地喊我外婆“妈”。她家里夫妻发生了矛盾，也跑到我家来，把我家当成她娘家。

后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母亲先被下放到远

郊农村，后又被调去成都工作。穆淑清也因“家庭成份”问题饱受政治运动冲击，她和我母亲的来往就中断了。

到60年代初，我四妹上小学了，正好是穆淑清教书的学校。开学第二天，是她教手工劳动课，课间作业时，她走到我四妹座位旁边，把我四妹看了又看。下课后，她把我四妹叫到办公室去，四妹不知有什么事，吓得心里咚咚跳。到办公室后，她问我四妹：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得到回答后，她高兴地说：“你回去给你外婆说，我叫穆淑清，是你妈妈的好朋友。我一上课就看到你太像你爸爸了！”

就这样，穆淑清通过我四妹又和我家恢复了联系。这时，我母亲也终于调回了重庆，被安排到城郊的木材综合工厂子弟学校教书。虽然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一次，但两位好朋友又可以经常见面了。因穆淑清的家当时住在小什字马路边，国庆节游行队伍要从楼下经过，所以好几年的国庆节，我妈妈都带着四妹她们到她家去，孩子们趴在窗口看游行，妈妈就和穆淑清在一旁“摆龙门阵”（聊天）。中午有时还在她家吃饭，快快活活就像一家人。

在我记忆中，穆孃孃留给我的，除了在我家经常进出的身影外，只有文革前最后一次见面的印象最清晰。

那时，我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于1964年初中毕业后被剥夺了升高中的权利。本来我准备跟其他一些有同样命运的同学一样下乡去“大有作为”（我那个年级的不少同学都去了大巴山的“社办林场”当知青），但我母亲坚决反对，为了说服我，还让我最信任的初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李老师（后来她因病没有再当班主任，只教我们语文）来劝我。天真的李老师（当时也只有二十来岁）认为我的成绩不可能考不上高中，力劝我再考一次。我于是又闭门苦读，等到第二年再考了一次，自然还是“不予录取”。这时，1965年秋，四川石油管理局到重庆来动员组织我们这些失学无业的“社会青年”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去为开采石油作修公路、平井场的“开路先锋”，宣称要开发“第二个大庆油田”。我当然就报名参加了这人生第一次的工作，庆幸自己终于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后来才知道我们当的只是不计工龄、没有地位的临时工）。

1965年9月8日，我高高兴兴地背着行李到望龙门街道办事处集合，随大队人马沿重庆下半城长江边那条解放东路、解放西路步行去火车站。当我们的队伍走到望龙门缆车站附近时，穆淑清忽然从马路对面跑过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一把拉住我焦急地问：“你走哪里去？你妈妈晓不晓得？”原来，她误以为我是在家里呆不下去了，自作主张瞒着家里到农村去当知青（大概母亲给她讲过我想下乡当知青的事）。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并告诉她，我妈妈已乘车先去火车站了，在那里等着为我送行，她脸上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匆匆离去。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会是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穆淑清在重庆市市中区东升楼小学（靠长江边的重庆下半城解放东路）任教，因“家庭成份”问题，不能教主课，只能教手工劳动课（剪纸、折纸、钉钮扣之类）。尽管如此，她教课仍很认真。我四妹从小是“左撇子”，但剪纸时左手用剪



刀总是剪不好，她十分耐心地教我四妹学会了右手用剪刀。

文化大革命时，穆淑清自认为“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与世无争，不怕什么。但她想得太天真了——当时被打倒的那些老革命哪个不是被罗织罪名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当群众性造反运动蓬勃兴起后，她虽然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因“家庭成份”问题，也不敢有任何“造反”举动，一直是袖手旁观的“逍遥派”。当重庆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她观点上倾向于“反到底”派，却又对本单位“反到底”派的几个人看不惯，而与本单位的“八一五”派人员亲近。这就使得她两边不讨好。我母亲认为这是她在单位上挨整时无人相助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1968年底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那时已是工宣队、革委会掌权），两派都不为她说话，她便成了大家都可以毫无顾忌打击的目标，再加上她平时注重仪表，用四川俗话说就是穿着打扮很“舒齐”，很“爱好”（重音落在“好”字上，即爱整洁爱漂亮），这在一般小学校里是很惹人注意甚至遭人嫉恨的。于是，她被当作“地主”第一个揪出来批斗。她坚决不承认是地主，有人受到60年代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启发，居然凭想象编出了她“坐着滑竿下乡收租”、“逼死了丫头”等罪名。给她戴上“大地主”的高帽子，拉她在毛主席像前下跪请罪，她说自己没有罪，坚不下跪，于是就遭毒打（我家一个邻居小男孩是那个学校的学生，后来也说，他们老师叫他们上去打）。我四妹看到那样的恐怖场面，吓得不得了，回家悄悄给外婆讲，外婆十分着急，叫四妹千万别再去参加那种会了，遇到开批斗会就躲远些，外婆说，有的老师晓得你妈妈和她的关系，怕万一被人说出来把你也抓上去斗……

有一次批斗会，穆淑清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有人怕打出事，就提出不要打了，拉去游街。谁知游街比挨打更使她受不了，她原是很爱面子，很注意仪表的人，当了十多年的教师，虽不能教主课，但也毕竟教过那么多小学生，也算得上是“桃李满天下”，哪里受得了游街这样的奇耻大辱！

她被从下半城拉到上半城，在市中心解放碑一带戴着高帽子游街回来，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身心交瘁。学校无人理睬她，她丈夫又同她长期感情不合，这时既不愿也不敢关心她。两个女儿搀扶她去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城内最大的医院，位于嘉陵江边的临江门岸坡上），医生一看就知是“牛鬼蛇神”（显然当时这种情况不少），于是内科推外科，外科推内科，都不愿给她治疗。她大女儿到处找熟人托关系去了，她就对小女儿说，看来这个医院不会给她看病了，还是扶她去第一中医院看中医吧。这些情况都是她女儿后来给我母亲讲的。我母亲分析，实际上那时她可能已决心自杀以求解脱了。

第一中医院在嘉陵江岸坡边的一号桥旁边。一号桥不是江上的桥，只是江边公路跨越岸坡断裂处一条小沟的旱桥（桥下有棚户区房屋，只有多年不遇的洪水暴涨时江水才会漫进沟来）。从重医附二院到第一中医院，要沿着弯曲倾斜的下坡公路（北区路）走很长一段，公路外侧有护坡的石砌堡坎和护栏，护栏和堡坎下是陡斜的岩坡，再下边有些地方建有简陋的民居“吊脚楼”。穆淑清走到半途，

推说走不动了，靠着路边石砌护栏休息，叫小女儿回重医附二院去把姐姐叫来一起扶她。小女儿走后，她就从石砌护栏翻出去跳下岩坡自杀了。

据说她当时摔下去并没有死。但她女儿返回来找她时，并不知道也不会想到她在那里跳下去了。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她。当天深夜有上夜班的工人从那下面过路时听到她的呻吟，跑过去看，还听她说了一句：“不要管我。”那年头这样的“非正常死亡”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正常”的常态，人人自身难保，谁还会去多事对她进行抢救呢？

当她刚开始在学校遭到批判时，我母亲听她诉过苦，曾劝慰过她，要她想开些，看长远些。我母亲自从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遭受过不少打击，心理承受力比她要强些。但我母亲那时在郊区上班，每周只能周末进城回家一次，回来也总是匆匆忙忙为同事当“采购”，帮忙在城里带买些东西，难得抽出时间与穆淑清见面。当时又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又正值厂里要求她教工人跳“忠字舞”，这可是了不得的“政治任务”，哪里能随便请假进城回家！后来母亲每忆及此，就会难过地说：“要是那时我有机会进城去看她，多有几个朋友和她说话，她也不至于走绝路……”

我家保存的这张穆淑清遗像是后来穆淑清的学校给她平反开追悼会时用过的。她女儿送了一张给我母亲。我母亲到追悼会上去代表死者生前友好发了言，又一次流了泪。

穆淑清还有个儿子，听说在她含冤逝世后，在小学里受到歧视、侮辱，不敢再上学，流落到社会上，被一个偷扒团伙拉下了水。一伙人被抓到后，警察看他年纪小，便从他身上突破，他作了老实交待，回到牢房却被同伙将他整死了。当时没有谁会关心一个在押“小偷”的死。因此他到底怎么死的也就无人知道了。

1980年代末，我父母去成都玩，还去看望了穆淑清的母亲，那时候老太太还健在，他们还聊了一些穆淑清和她的继父李仲池以及合江老家的往事。

---

## 【故纸堆】

### 江西武斗初期一份死者名单

李晓航 录入、整理

说明：这个名单选自江西农学院《井冈风雷》报社1967年7月16日编印的《悲壮的史诗——6·28、6·29莲塘地区反革命暴乱专辑》一书第84-85页。原件为表格，为便于排版，笔者录入时转换为文档格式，原有的个别错字如“圆形”改正为“圆形”。

1967年6月，由江西省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简称“联总”）与南昌的造反派组织“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发生尖锐冲突。由于“大联筹”控制了南昌市和许多城市，“联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鼓动农民“攻克南昌城”。6月28

日和 29 日，“联总”组织大批农民和基层民兵携带枪支和大刀、长矛，围攻南昌城南莲塘地区江西农学院的造反派，致使“大联筹”一方多人死亡，百余人受伤，酿成惨案。7 月 13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8 月 10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定“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支左。

以下名单是这次武斗中“大联筹”一方的死亡人员。标题中的“反革命暴乱”是“大联筹”一方当时的说法。

## 在 6. 28—6. 29 反革命暴乱中壮烈牺牲的我革命战友

### 辛美佬

男，20 岁，南昌五中“一小撮”兵团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 67. 6. 29，检验时间 67. 6. 29。主要伤害：左胸第三、四肋间锁骨中线处有一椭圆形射入口， $0.7 \times 0.8$  公分，弹道由上斜向内，下达胸膛，无射出口。致死原因：中弹造成内脏损伤血管破裂流血过多致死。

### 李尚希

男，19 岁，省粮校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 67. 6. 29，检验时间 67. 6. 29。主要伤害：头顶右侧有一圆形射入口，直径 0.6 公分，弹道由右稍斜向左下，穿过脑组织于枕骨左侧有一射出口  $1.5 \times 1.6$  公分，形成贯通枪伤。致死原因：中弹颅内损伤致死。

### 高卫海

男，35 岁，农学院教工。死亡时间 67. 6. 29，检验时间 67. 6. 29。主要伤害：上腹部左侧有一刺创， $3.2 \times 1.5$  公分，大网膜从创口露出，在左侧腰大肌处有一  $3 \times 1.5$  公分创口，组织外翻，两处创伤形成贯通刺伤。另外全身共有大小不等的刺伤十余处。致死原因：刺伤造成内脏破裂失血致死。

### 费荣华

男，22岁，服装鞋帽工业公司职工。死亡时间67.6.29，检验时间67.6.29。主要伤害：背部胸椎左侧有卵圆形射入口 $1\times 0.8$ 公分，弹道由左侧向右上前斜行至肩峰前下4公分处有一射出口 $4\times 5$ 公分。致死原因：中弹致胸腔、脏器破裂失血致死。

#### 胡民强

男，22岁，南昌百货商场职工。死亡时间67.6.29，检验时间67.6.29。主要伤害：头顶右后角有一射入口 $0.4\times 0.5$ 公分，深达颅内组织形成盲管枪伤。致死原因：中弹脑组织损伤致死。

#### 唐其林

男，18岁，长江航校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67.6.29，检验时间67.6.29。主要伤害：右肩胛下角外缘处有一射入口 $0.6\times 0.7$ 公分，弹道由右肩胛下角斜向上穿过肩胛骨中部直达胸腔，形成盲管枪伤。致死原因：中弹致使胸腔、脏器破裂失血致死。

#### 章子敏

男，20岁，南昌交通学校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67.6.29，检验时间67.6.29。主要伤害：在左腋窝下背侧有一射入口 $0.8\times 0.5$ 公分，弹道由左向右斜上，致右侧乳头上锁骨中线处有一射出口 $1.8\times 1.7$ 公分，形成贯通枪伤。致死原因：中弹致使胸腔、脏器破裂失血死亡。

#### 邹建军

男，18岁，南昌五中“一小撮”兵团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67.6.30（29日受伤，抢救无效），检验时间67.6.29。主要伤害：头部枕骨右侧有 $0.4\times 0.5$ 公分射入口致使颅骨骨折及脑组织损伤，无射出口。右肩胛骨外角1公分处有一卵圆形射入口 $0.6\times 0.5$ 公分，在右肩胛处外角上取出一颗铅弹头。致死原因：中弹脑组织损伤致死。

#### 向毕闻

男，19岁，南昌十中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67.6.29，检验时间67.6.29。主要伤害：前额中线稍左侧发际处有 $0.4\times 0.6$ 公分射入口，弹道由前向后致枕骨处有射出口 $1.8\times 0.9$ 公分。致死原因：中弹致使脑组织损伤死亡。

#### 张厚太

男，19岁，江西电机厂井冈山兵团，徒工。死亡时间67.6.29，检验时间67.6.30。主要伤害：在右肩峰下3.5公分背侧有一 $2.5\times 1.8$ 公分射入口，弹道由右上斜左下达胸腔，无射出口。致死原因：中弹致使胸腔、脏器破裂失血死亡。

#### 程应琅

男，17岁，南昌十八中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67.6.29，检验

时间 67.6.30。主要伤害：腹部脐下正中线 1.2 公分处有射入口 0.5×0.6 公分，弹道从右上稍向同下至左侧臀部有一射出口。致死原因：中弹致使腹腔内脏损伤失血死亡。

### 石运新

男，19 岁，江西农校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 67.6.29，检验时间 67.6.30。主要伤害：胸部左侧乳头下 6 公分处有一刺伤，2.5×0.3 公分，深达胸腔。另外在胸部左侧和右膝盖下，有散弹枪伤各一处。右前臂上 1/3 处 7×3 公分的砍伤。致死原因：锐器刺伤在胸部致使胸部内脏破裂失血死亡。

### 张健民

男，43 岁，省物资局干部，省直保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省直物资系统革命领导干部革命造反联络组。1942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生前为机电局副局长，行政 14 级。死亡时间 67.6.29，检验时间 67.6.30。主要伤害：头顶有创口 0.7×0.1 公分，深达骨质。左右鼻腔有血液流出。左胸乳头内下 1 公分处有一 4×3 公分血肿。左前臂尺、挠中段呈横断骨折，骨折周围血肿。右小腿胫、腓骨中段有一横断性骨折。此外其他部位有大小不等的散在的钝锐伤 10 余处。致死原因：钝锐器造成内脏器破裂失血死亡。

### 无名尸体

男，15 岁左右。检验时间 67.6.30。主要伤害：头部人字缝合线左侧有一表皮刺脱 1×0.8 公分；胸部胸骨体左侧有一血斑 1.5×1 公分，呈斜横形；鼻腔有淡红色血水流出。致死原因：根据介绍的情况，该死者可能是因脑挫伤致死。

### 田保荣

男，27 岁，七〇九井冈山兵团副总指挥，工人。死亡时间 7.1。致死原因：枪杀。

### 朱利民

男，南昌县莲塘镇人民“鲁迅”战斗队红卫兵，通讯员。死亡时间 7.1。致死原因：枪杀。

### 王修俊

男，莲塘中学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 7.1。致死原因：枪杀。

### 陈者魁

男，19 岁，交通学校红卫兵，学生。死亡时间 6.29。致死原因：肝脏被弹打开了花，肺部、隔肌也被弹穿过几个大窟窿，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

### 【故纸堆】

## 宾阳县“文革”大事件

## 中共宾阳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87 年 8 月

按：本篇原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 2 册），1987 年 9 月。选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网络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现美国各大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已有收藏并可查阅。本篇资料包括宾阳县在 1968 年贯彻“七三”布告中发生的成批杀人事件、宾阳中学残杀师生事件、邹墟区“六四”杀人事件三大事件。

### 宾阳县在贯彻“七三”布告 中发生成批杀人事件

1968 年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宾阳县在贯彻中央“七三”布告的 10 多天内发生了乱打死 3681 人的严重事件。杀人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在宾阳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演出这场大批乱打死人的历史悲剧，是当时县主要领导王建勋、王贵增等组织策划进行的。

#### （一）

1968 年 7 月，中央为了解决广西“文革”中出现的打、砸、抢、抄等严重问题，发下了“七三”布告。《布告》声称：“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强调：“要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7 月 20 日中午，县革委副主任、县人武部政委王贵增在县革委召开区、镇干部和下乡宣传队的电话会议上讲话强调：“把阶级敌人揭出来，广大群众公认为坏人的，要坚决打击，坚决处理。有些事情你们可请示，有些有把握的不请示。”又说：“三个镇（芦墟、新宾、黎塘）坏人不少”，“我们是否有心慈手软？应干就干，怕什么？”根据电话会议精神全县 173 个公社（后改为大队）普遍召开会议贯彻，并同时以社为单位举办贯彻落实“七三”布告骨干学习班进行所谓“武装思想”。

7 月 24 日，宾阳县革委成立由王建勋（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县革委主任）、王贵增（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凌文华（六九四九部队独立营副政委）、黄智源（六九四九教导员、县革委常委、支左办公室副主任）等 4 人组成的贯彻落实“七三”布告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后，即指示县公、检、法军管会及时了解 and 掌握“敌情”。宾阳县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蒙伍存（人武部军事科副科长）以军管会的名义用电话通知基层公安员收集“敌情”，又给基层派出所、法庭发出宾军管办字（68）第 5 号《关于掌握情况的通知》，要求在 7 月 20 日（本

刊注：原文如此）前将“敌情”汇报到县。

7月25日下午2时，王建勋叫新宾镇革委副主任兼武装部长李发新通知该镇革委主任何其清到新宾区谈话，新宾区革委会主任何作人也在座。在谈话中王建勋对两何批评说：“你们新宾地区贯彻‘七三’布告很不够，行动不力，阶级敌人还很嚣张，如东风街的反革命分子伪军少校黄德三，还穿着伪军服到部队门前示威，乌龙四（罗桂昌）这家伙还跳得很高，你们要很好发动群众批斗他们。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在批斗中，即使群众有些过激的语言或行动，我们也不要出面指责、制止或泼冷水。但有一条，不准动用武器。回去后找各单位头头来开个会，贯彻下去。”

7月26日，县革委在新宾派出所召开三区（芦墟区、新宾区、邹墟区）、两镇（芦墟镇、新宾镇）公安员、派出所长会议，王建勋在会上说：“对坏人处理，杀个把不要紧。杀人犯的要干掉，民愤大的可以干掉。‘七三’布告是什么时候了？坏人可以专政。”还说：“掌握斗争的深度广度，轻的交给群众搞，要相信群众，真正死就死吧！我们对他们不能讲理，两个阶级，不是我们消灭他，就是他消灭我们，和平共处是不行的。”王建勋在讲话时还点名：“对罗桂昌（劳释犯绰号乌龙四）要专他的政，但革委会不要开这个口。”

“三区二镇”会议一结束，各区镇都赶回去召开区革委领导和各公社领导会议，传达王建勋的讲话，大造杀人舆论。7月26日新宾镇在派出所楼上召开镇直属机关、派出所、各街道、农业大队负责人会议。何其清在会上传达王建勋在新宾区的指示精神后，派出所所长黄兆仁即将四类分子名单和他们的表现逐个向与会人员介绍，接着各个街道、单位作补充。东风街主任谢绍忠说：“东风街黄德三、罗桂昌跳得很凶，也很嚣张，黄德三还穿着伪军少校服装去部队门前示威，应该批斗。”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在会上也提出了要批斗的一些名单。何其清、李发新、黎业洪（镇革委常委）、黄兆仁都一一将这些名单记录了下来。会议最后决定先由东风街组织批斗黄德三、罗桂昌。当晚，东风街革委组织群众在南桥头召开批斗黄、罗大会，还拉陆沛周（新宾镇联中老师，“四·二二”派）去陪斗。斗争大会开到10点多钟，黄、罗就被群众用石头、木棍当场打死。拉去陪斗的陆沛周被押回镇审讯，逼他交代自己是“反共救国团”成员问题。陆沛周不承认，何其清认为陆不老实交代，便说“做去！做去！（打死去）”。谢绍忠便叫赖德亮说：“阿亮，将陆沛周押到指南针处。”赖德亮将陆沛周押到指定的地点，叫陆沛周跪下，谢绍忠当即开枪打死陆。

7月27日早上（即打死黄德三、罗桂昌、陆沛周第二天早上），何其清在镇革委会议室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具体布置当天杀人的行动。参加会议的有：何其清、李发新、黎业洪、黄兆仁以及纠察队员曾祥稳（农业大队文书、纠察队副队长）、宋日光（南街主任、纠察队副指导员）、谢绍忠（东风街主任、纠察队队长）、张光礼（市管委负责人、纠察队员）等10多人。何其清首先说：“今天是新宾墟日，各区有人来参观我们贯彻‘七三’布告情况，我们要抓一些人来游街，大造落实‘七三’布告声势。”何讲完话，大家拟出了游街人的名单。李发新吩咐纠

察队按照名单去抓人，并把抓来的都挂上牌子游至预定的地点打死。李发新布置：“分三个地方执行，一是指南针脚下，由宋日光负责带队打死 5 个人；二是去三中岔路口，由曾祥稳带队负责打死 4 个人；三是由谢绍忠带队去武陵路口打死 3 个人。”

当天上午何其清还派张光礼、谢绍忠到公安局看守所押罗龙生、湛世君（“四·二二”派宾中学生头头之一，现黎塘水泥厂工人）回新宾镇。去前，何其清交代张、谢两人：“回到半路将罗龙生当作逃跑处理。”张、谢两人按何的布置，将罗龙生押回到邕柳公路与往南街三岔路口时，开枪打死罗，并将事先写好的所谓“反共救国团骨干——罗龙生”牌子放在死者身上。湛世君幸存被押回新宾镇。

同一天，李发新还派张光礼、黄振多到古辣公社义陈大队抓回插队青年黄宁基，当晚交给纠察队批斗，没有得到什么结果，黎业洪、张光礼、黄祥基、周作标、宋日光、曾祥稳等人就将黄宁基拉至新宾风景路用绳子勒死。

7 月 27 日晚新宾镇革委还召开了所谓落实“七三”布告和执行王副师长指示的总结会，李发新在会上把上述杀人事件总结为所谓“行动迅速”，“执行指示坚决”。

7 月 27 日，原新宾区蒋何公社革委主任黄宝荣，在公社干部、民兵骨干会议上传达完王建勋的讲话精神后，组织与会人员研究所谓“专政”名单，布置当晚分片批斗四类分子，并按原定计划于晚上 9 时把“专政”对象 27 人拉至周背岭（地名）进行集体枪杀。

7 月 27 日，王建勋到新桥区检查，对区革委副主任韦文英说：“新宾的风吹到你们这里来了吗？”新桥区根据王建勋的授意，于次日在区小食堂召开公社支书、工作队长、区直机关领导紧急会议进行策划，并于 29 日召开大会，各社把所谓“专政”重点人和“23 种人”押来批斗。这天斗争大会共打死 8 人。

7 月 28 日，县人民医院“联指”派头头之一卢尚宝，根据“三区两镇”会议精神，将所谓有问题的院长李贵生、副院长兼内科主任邓启俊、外科主任刘大德、妇产科主任刘霄桐、药剂师卢长祥、会计梁志颖、总务杨志共 7 人，集中挂牌，并派医院职工陈国亮负责将他们列队从新宾至县城芦墟游街示众，当游到芦墟中心十字路口跪下“请罪”时，全部被群众用石头、木棍打死，有的被打得脑浆四溅，惨不忍睹。当驻医院宣传队长李明回县向王建勋汇报这一事件的情况时，王建勋说：“医院 100 多人死他十几二十多个算什么？现在刚刚开始！还要回去给他们讲清，要鼓起劲，挺起腰杆干下去，不要死了几个人就怕了。”李明听了王建勋的话，杀劲也鼓起来了，7 月 30 日亲自点名派人将骆毅（医院干部）、陈颖佛（医院干部）拉到新宾街给人打死。

## （二）

1968 年 7 月 27 日，为了在全县范围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宾阳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县各区镇派出所长、公安员和县公检法机关全体干部。28 日没有开会，到会人员上街观看芦墟街打死人现场，29 日上午，



会议正式召开，会议由县人武部军事科副科长兼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蒙伍存主持并讲话，蒙说：“我们打击的锋芒要对准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二十三种人’，有破坏活动的也要搞一搞，斗一斗，对投机倒把的也要扫一扫他。”“对四类分子要干掉他四分之一”，“我们的同志此次下去，以当观察员的身份出现，主要的任务是观察，当好革委的参谋。”

“要下去点火，现在形势你们都看到了，要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要声势浩大，不能右倾。”“真正的坏人被群众杀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绝对不能去泼冷水。”

“发现有重大线索的阶级敌人，要马上弄清，我们要亲自出马，进行审讯”，“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宾阳有，总头子在广州，头头来过我们这里，吴镇裕是骨干。”

“边斗争，边追查罪恶事实线索和根据，这样才能稳、准、狠，不然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早死了。”“群众已经认为是坏人的，必须先斗争搞臭再‘专政’，最好是发动群众用石头和木棍打死他们，杀坏人不要用枪，不要用子弹，更不能采用成群来用枪杀，这样教育群众不大，要在群众中零敲碎打。”接着，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兼宾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建勋讲话，他说：“我们打这一仗，时间从7月26日至8月15日为一段落，这段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次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赌头、闹分队的为首分子，县的重点在新宾、芦墟，现在新宾已拉开序幕，不要看不惯，气可鼓不可泄，这些人交给群众‘专政’，用不到三天时间就干掉了，又不花一枪一弹，这个任务要执行，但又不能开大会，大张旗鼓去发动，只能个别点火，群众认为是坏人的要‘专政’，你们不能束缚群众手脚，群众起来了不能泼冷水。”

“这次行动，时间三天，行动好坏是衡量那个地区领导的觉悟如何了，今天我讲的，只能是在座的知道，回去后不能说是上级布置，就是你们讲我也是不认账的。”

王建勋说完后，蒙伍存通知事先安排好的派到各区、镇充当观察员的公安员留下，宣布分工名单，每个区派1至2人，当时被派下去的人员有的不懂工作如何进行，纷纷提出各种问题，蒙伍存一一作了解答。会议就这样结束。

7月29日下午，县革委在大礼堂召开全县各区武装部长和小公社民兵营长紧急会议，会议由宾阳县人武部政委兼宾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贵增主持并讲话，他说：“区镇武装部要办民兵营长学习班，学习内容是对‘七三’、‘七二四’布告的理解。”“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基干民兵学习班，内容方法与上面同。”

“毛主席叫我们向阶级敌人进攻，但要稳、准、狠，把这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只要是阶级敌人，不管什么观点，都要斗争，要点革命火。是坏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能损害。”王建勋接着在会上讲话，他说：“这几天都动起来了，有的动得有力，有些动得不力，有些还在那里拖拖拉拉的不动，各区应分别讨论一下，回去统一行动。两个布告一个批示主要精神就是发动群众，猛烈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主要斗争锋芒是哪些人？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些牛鬼蛇神。在农村在城镇都要对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还有其他事情也要扫一扫，投机倒把首要分子、头子、赌棍、赌头、分队的地方查一查，谁在里头搞破坏活动，叫生产队长交出

来。”“现在先抓外边，后抓内边坏的。……运动开展，民兵营长、公社干部抓几个坏人是可以的。但是发动群众起来，由群众处理，群众整他，不要浪费子弹，由群众斗他、整他、处理他，这样才能发动起来。把罪大恶极的交群众处理。”

“群众起来后，甚至打死些坏人，革委会成员不能泼群众冷水，民兵营长也如此。……不能讲可以杀人，谁个讲就变为幕后指挥。如果是真正坏人，群众认识，由群众斗，就会报销。”民兵营长紧急会议当天结束。

7月29日晚上，县革委会召开了革委工作人员会议，王建勋在会上说：“对群众的看法，群众未发动起来前，说敌人猖狂，要杀几个，群众起来，又东指责西指责，又认为乱了，你是站在群众面前领导群众前进呢？还是站在群众后面指手划脚制止群众运动，如果不是领导群众，那就考虑你的立场问题了。”

县革委召开的上述公检法军管会，区武装部长和小公社民兵营长会，县革委工作人员会，是组织、策划、布置杀人的一系列会议。特别在会上对新宾严重杀人事件在会上不但没受到批评，而是当作杀人序幕，导致了后来在全县发生了一系列的严重杀人事件。

①7月29日，大桥区罗江公社民兵营长李庆生，从县民兵营长会议结束回到小公社，当即召集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该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李毓军，副组长李帝严，成员李树杰、陈宽文、丁孔德、丁家进、陈利文等8人。李庆生主持会议并传达王建勋等人在民兵营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在会上策划打死吕村的蓝学珍、吴善成，老罗村丁造德，黄岭村陈志道，新罗村的丁祖才，长江村的严付邦、严洗仁等8人。30日晚在公社召开群众大会，由各村民兵连长把要杀的人押到公社批斗。当晚参加会议的群众约有二、三百人，会上李毓军讲话，号召群众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接着批斗丁造德，然后由李庆生宣布上述8人的罪状。会一结束，即有长江村的民兵骨干，积极分子严一民、严振才，黄岭村的陈利文、陈京虞，老罗村的吕启华等人将这8人拉到老罗村的卯息岭瓦窑地方乱棍打死。

8月2日下午，该社“抓促”领导小组又召开全体成员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李毓军、李庆生、李帝严、李树杰、陈宽文、丁孔德、丁家进、陈利文等8人，会议由李庆生主持，由李毓军传达区革委8月1日召开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会议精神”。会议正在开始，原大桥区革委副主任雷福贤、干部李开贤来到罗江公社检查落实“七三”布告（指打死人）的情况，雷即找李毓军汇报，并对李说：“你们要吸取第一批的教训，都是打些老太婆，有活动能力的伪军官、伪职员都没有打。”还说“我来不是要生产进度，是来要你们打死人的进度的。”并伸出他两手掌对李说，你们公社起码要搞他一百个（打死）。雷、李走后，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继续开会，大家讨论，仍由各村提出要打死的人名单：吕村的李树辉、吕孔昭，黄岭村的陈简文、陈昭道，新罗村的丁祖琪，长江村严济邦。研究决定后即分头回村通知群众及民兵，下午在公社召开批斗大会，并叫各村民兵连长下午3时将上述6人带到公社。下午4时左右大会开始，到会群众约三、四百人，李庆生主持会议，李毓军讲话：号召群众继续向阶级敌人开展猛

烈进攻，以实际行动落实“七三”布告。后由李庆生宣布6人的罪状和对他们实行“专政”，接着参加会议的纠察队、民兵骨干把这6人拉到公社西面的瓦窑边打死。到现场的公社“抓促”领导成员有李庆生、丁家进、陈利文。长江村地主分子严济邦被打死后，在场的陈其家、李树恩（久患哮喘病），听说吃人肝可治哮喘病，想取严的肝吃，但因久病体弱，无法动手，正在旁边的陈经邦（曾做过屠夫）看见后，即手持杀猪刀割开严的腹部，用木棍撬出肝，陈其家用刀割下挂在学校边的桉树枝上，然后和李树恩分别拿回家煮吃：严的肝被割后；肠子外流，遍身血污，其惨景真是目不忍睹。

②7月29日，甘棠区甘棠公社民兵营长梁汉生参加县的民兵营长紧急会议回去后，召开公社干部及生产队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王建勋的讲话精神，会上布置分片规划“专政”名单，会后打死25人。30日，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姚尚强带领民兵将王宗博拉到遗爱桥头用木棍、石头活活打死。为了防止其弟日后报复，又派人到甘棠中学等候，待其弟王宗升从峦城取鱼苗回来时又将他打死。打死这两兄弟后，又抄家。8月3日晚，姚尚强兽性发作，窜到王宗博家对其妻颜秀清进行威胁并将颜强奸。颜秀清被强奸后，隔两晚，关有志又闯入屋内，企图强奸颜秀清，后因颜哭喊，关强奸未得逞。颜秀清和小婢陆爱玲年轻守寡，感到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逼得颜秀清带着小女儿改嫁到邓村大队，小婢陆爱玲也改嫁到那宁大队，房屋被生产队没收作牛栏和仓库，王宗博的女儿王丽竹跟母改嫁到邓村大队那洞村后，一直受人歧视，讽刺打击，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致使神经失常。

7月底，王建勋打电话批评甘棠区革委主任、武装部长李洪旺说：“你们贯彻‘七三’布告抓得不力，要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不要束缚群众手脚。”李洪旺受批评后下到高棠公社，当晚就组织群众批斗并打死4人。该区到8月1日，共打死160多人。

③7月底，王建勋打电话给思陇区，批评他们：“你们行动太慢。”思陇区受到王建勋的批评后，立即召开区革委常委扩大会，并采取紧急措施，决定将南关、胜龙、平安、黄冠等四个公社和区直机关等单位的所谓“专政”对象共37人，统一集中到六进坪（地名）全打死。

④7月29日，原古辣区义陈公社民兵营长陈汉章参加了县革委会召开的民兵营长会议，会上听取了王建勋关于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讲话后，在会议讨论期间，便规划了本社专政对象名单：韦恒有、韦锦枝、赖焕香、彭树林、陈文中、赖仓玉、李武基等7人，报给区革委副主任黄明安。

县民兵营长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陈汉章回到本公社，向大队支书陈梦清、公社主任李世安汇报会议精神，征得他俩同意，决定开支委会传达县民兵营长会议精神，然后，3人分头通知各片支委。

7月31日，支委会在社办公室中楼召开，陈梦清主持会议，陈汉章传达县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精神，陈汉章把他在县规划的名单讲给支委听，然后组织大家讨论。最后，会议决定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和群众誓师大会。

8月1日，该社在古辣镇宾墟三眼铺召开了支委扩大会，公社定工干部、党员、生产队长、贫协代表、民兵骨干约70人左右参加了会议，古辣区下乡宣传队蒙泽前、韦世典、吴绍青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梦清主持，陈汉章传达王建勋的讲话精神，要求迅速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区干部韦世典代表宣传队在会上讲了话，强调要打主动仗，不要打被动仗。会上，陈梦清还布置要求公社定工干部原在哪个片就负责那个片的讨论，要联系本社、队实际，“把专政对象落实好。”

当日下午，各片负责人向陈梦清、陈汉章汇报“专政”对象数字，大陈片负责人报“专政”名单7人；义陈片负责人陈庚秀报8人；平南片负责人李世安报4人；黎元片负责人陈梦清报2人；小满片负责人陈汉章报2人；七联、龙泉片报4人，总共27人。“专政”名单落实后，陈梦清布置8月2日开群众大会，地点在陈屋家庙，四类分子集中在镇宾墟中间地坪。“专政”时（即用棍打死人时）由各村自己行动，布置完后散会。

8月2日，按骨干会议的布置，群众誓师大会在陈屋家庙召开，参加会议的群众有2000人左右。陈梦清主持会议，陈汉章传达县会议精神，会议开了2个钟头后由治保主任胡付香、陈庚秀负责组织批斗“专政”对象。批斗后即由各片民兵将“专政”对象拉到原公社办公室铁门外捆绑，然后由陈茂秀、陈汉宁、陈庚秀、陈锡英等人集体押到古辣墟北面渡塘岭，由凶手韦统和、韦悦应（已死）、韦精忠、韦子宣、陈济林、陈汉宁、陈锡英、黎宁林、李友邦、陈庆齐、陈圣元（已死）等人用木棍打死，在这一事件中，受害者共有24人，全部是群众。

⑤7月29日，原大桥区丰州公社民兵营长兼“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黄伟善参加县民兵营长会议，当天下午回去在公社办公室向该社党支部书记黄永宋、主任江超世、文书兼“抓促”领导小组组长江明昌等人汇报，当天决定次日召开生产队干部以上的会议传达民兵营长会议精神。7月30日，黄伟善传达完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王建勋关于贯彻“七三”布告的指示，接着经黄永宋同意，领导班子留下研究，决定当晚分片召开批斗会以及交群众斗争处决的名单。黄永宋强调说：“今晚分片召开批斗大会，各片要注意斗争锋芒，各片负责人一定要把关，有些家属可能出来帮，我们眼珠要动。”因此，当晚各村斗争后，将张维玉、江现豪、思德华、江国信、江家驹、程烂忠等6人打死。

7月31日，又在公社召开全社党员、干部骨干大会，斗争打死江超信1人，事前经黄永宋参加的领导班子会议研究统一布置，黄永宋还在大会上讲话，指出：“抓生产很重要，但也要抓革命，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8月1日，大桥区革委召开各公社“抓促”组长、民兵营长会议，布置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江明昌、黄伟善参加这一会议回去当天，召开公社干部会传达，到会的有黄永宋、江超世、罗江寿、巫连辉（信用社会计、“联指”派头头）、江超群（治保主任）。巫连辉也在会上汇报区干部黄及应（团委书记、“联指”政委）对他讲的话：“大桥这边形势发展很快。”“你们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与会者认为应该赶上形势，讨论决定：（1）将集中在公社训示

的三十几个人全部“专政”（处死）。(2)第2天（8月2日）召开党员干部骨干会传达会议精神后执行。(3)各片负责处决本片的人。最后黄永宋布置说：“各片回去负责通知各片的人，早点来公社集中。”

8月2日，全公社骨干100多人集中在公社旁边的草坪里开大会，由黄永宋主持会议并在会上讲话指出：“对党不满的分子今日一笔勾销。”散会后，分片（组）讨论，题目是集中到公社训示的人该不该杀？各片如何实施？讨论中，黄永宋到各组检查，对下州组的骨干讲：“你们的人是否到齐，如不齐，要马上派人去叫来。”明新组黄祖奇（队长）向黄永宋提出陈乃成不该杀，经黄永宋同意，同时令其将陈带回家。在讨论到如何实施时，很多人不出声怕下手。为此，江明昌到巫连辉家，想征求黄永宋和巫连辉的意见。在巫家门口碰见巫，江问巫：“各片不敢动手，怎么办？”巫讲：“吊你妈，费那么多神气，统统推到煤坑去，既不费力，又不污，干干净净几好，像红桥那样，血和脑浆飞出来到处是污。”当时黄永宋坐在巫连辉床上，江进屋问黄：“宋哥，你还有什么交代吗？”黄永宋说：“因我身体不好，我已经交代巫连辉出去了。”江也认为推入煤坑是个好办法，便跟巫到各组讲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由明新片带头执行，用绳子分别一个或两个捆绑串在一起，驱赶至煤坑，拥推和逼跳下水溺死。风山组因迟迟没有行动，黄永宋去指责讲：“你们风山片是怎样搞的？”在场的韦保杰（党员，已死）就对本片的人讲：“醒水呀！弟队。”随即将本片的韦继堂等3人赶到煤坑推下去溺死。当日推入煤坑溺死29人，其中男的22人，女的7人。明新村的谢福英，原是船家女，被推下坑后，游在水上叫喊，新村的民兵陈洛文用矛枪戳了4枪致死。

8月3日，继续召开党员、骨干大会，斗争张天渊、江国钦，斗争后2人捆在一起推入煤坑，黄日见也被抓来推入煤坑，当天共溺死3人，最后黄永宋作总结讲话说：“我们有些党员还未醒，张天渊被推入煤坑后还喊反动口号，让这些人活着怎么得了。”

7月31日，原大桥区连朋公社在区革委常委黄及应、李开贤的督促检查下，由治保主任宋凤康主持召开了全社党员、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会议，传达贯彻王建勋7月29日在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各区（镇）公安员，派出所所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研究决定了第二批处决的“阶级敌人”25人名单，当天晚上将这些人全部抓到公社关押，第二天（8月1日），天刚蒙蒙亮，治保主任宋凤康亲自率领纠察队先将16人五花大绑押到公路旁，用木棍活活打死，此时，王建勋坐小车经过，还下车观看了现场。中午又将余下的9人绑赴车箭岭打死，打死后，宋凤康还指定专人逐个进行检查，发现宋凤义尚未断气，就用刺刀将其腹部捅开，肠子流到外面，用刺刀割断宋凤伦的喉咙。其中，宋安义一家被打死6人，这家6人被打死后，宋学理的父亲宋安上又被多次批斗，打断肋骨，被迫自杀。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生产队评工记分给低等，自留地作物被人毁坏，家禽被人毒死，屋瓦被人用石头打烂，小孩上学被歧视毒打，她们感到在连朋再无立足之地，宋安义、宋安伦、宋其康的妻子被迫拖儿带女改嫁他乡，宋安上的妻子年纪大了

无法改嫁，逼着将 16 岁的女儿宋凤秀出嫁到陆川县，自己带 1 个女儿跟去，当宋凤秀回来迁户口时，治保主任宋凤康还勒索 30 元钱才给证明，宋其康的妻子韦芬林改嫁时，接亲的人还被捉来灌狗尿。

⑥7 月 31 日，武陵区新塘公社在办公室召开全社共产党员、生产队干部会议，会议由该社党支部书记黎见宽、民兵营长何仁贤，治保主任霍仁祥分别主持，县公检法军管会派往武陵区的观察员施汝楷在会上宣读“七三”布告，同时介绍了邻近公社贯彻落实“七三”布告打死人情况，黎见宽传达武陵区革委会召开的关于贯彻落实“七三”布告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会议精神，民兵营长何仁贤传达县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精神，治保主任霍仁祥也在会上讲了话，然后分片讨论规划打死人名单，新塘片参加会议的人员刘正标、黎见保等人提名说：“刘日恒放毒到生产队的秧苗田里去，破坏农业生产，刘华恒（刘日恒同胞兄弟）不服从管制，不听从生产队安排工作，黎见盛是恶霸，不服从干部安排，对村上人态度恶劣，打骂了不少人，这 3 个人应该‘专政’。”因此，当天的大会就决定打死刘日恒、刘华恒、刘清恒、黎见盛、黎见浩等人。并要求全社的四类分子一同押去武陵游墟。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下塘村民兵连长黎见保和该村干部黎见锦等人下塘村“三支训”主持召开该村党员、队干会，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黎英豪、黎天进，黎天晓，黎天良、黎兴高、黎朗座等 10 多人，会上黎见保、黎见锦讲了当天他俩到公社开会精神，黎见保说：“本村的黎见盛，黎见浩 2 人，公社会上已定为打死对象。”还说：“我看黎见识（黎见盛、黎见浩、黎见识系 3 胞兄弟）、黎天然（黎见盛的长子，当年 16 岁）也一起送去游墟，不然的话，不打他们的威风，恐怕以后那也会报复，铲草要除根。”到会的人员也同意一起铲除黎见盛家的男人。

8 月 1 日上午，上刘村三队队长刘正标按照公社干部黎见宽，霍仁祥的指示，安排刘日恒去耙田，上午 9 时许，公社民兵营长何仁贤带领黎见保（身带尖刀）、磨用羽、黎天晓、黎见华、霍仁祥和黎启余等人到田头捉拿刘日恒，刘正标叫刘日恒上田基后，磨用羽即把刘日恒绑住看守，霍仁祥、黎见保等人抄了刘的家，然后将刘日恒、刘华恒、刘清恒押到新塘公社办公室集中。与此同时，党支书黎见宽利诱刘日恒的长子刘正甫与其父划清界线，刘正甫手拿一条犁柱木，朝刘日恒头部打去，当场死亡。治保主任霍仁祥带队将上吊自尽半死的莫绍明拉到公社办公室集中，然后安排其他四类分子抬去武陵游墟，抬到途中高挂村新坝处，磨用发就命令抬去的人将莫绍明丢下水中，然后逼迫莫绍明之母亲凡注槐等人用脚踩住莫的身躯，压入水里活活淹死。民兵营长何仁贤带领刘正标，谢耀章、何星群等人一起将刘华恒、刘清恒、黎见浩、黎见识、莫绍杰、莫树祥、黎见伦、何君富、刘正华、黄注臣等 10 人押到武陵游墟，全部被赶墟的群众打死。

8 月 1 日，黎见盛见势不好，逃到古辣新胜公社马安村亲戚家躲藏，后被该社党支委陈学胜等人发现，抓后指派民兵送回新塘交给治保主任霍仁祥，霍将黎捆绑在办公室旁边的一棵苦楝树下暴晒太阳，下午 1 时许，黎叫肚饿口渴，要求

给点水喝，而看守民兵却不肯给，黎见盛由于经受不了饥渴和烈日暴晒的折磨，于下午2点钟左右惨死在苦楝树底下。

8月2日早上，黎天然约黎天送一起扛猪到古辣墟出卖来还信用社贷款。黎见保闻讯后，带领磨用发、黎天进、黎天良、黎英豪、黎兴高、黎天晓等10多人到途中拦截，当黎天然回到老坝头江桥时，被黎见保等人截住，并被绑住手脚，由黎见保、黎天进、磨用发3人一起将他丢下老坝头江淹死。

黎见盛和兄弟黎见识、见浩以及儿子黎天然被迫害致死后，留下其母和妻子李子盛及见识妻莫果珍带两个幼女度日，她们处处受歧视，不久莫果珍被迫携带两个女儿改嫁他乡，留下两个老人孤寒度日，黎见盛一家留下的6间房屋也被生产队全部没收为仓库，国家补贴的孤寡老人补贴费，也被生产队截留占用，黎见盛之母因经受不住打击，于78年病故。弄得黎见盛全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催人泪下。

⑦7月31日，原武陵区上施公社老廖村黄树松纠集生产队副队长黄树强、民兵黄炳光等16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县革委关于贯彻“七三”布告精神，会上黄树松提出要打死黄干先等4兄弟，理由是干先的父亲生前埋有枪支弹药在祖坟里不交出来，后到会人员通过。晚上就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黄泽先、黄干先、黄仲先、黄更先四兄弟及侄儿黄炳豪，斗打后黄更先见势不好，趁人不备之机逃跑，其余4人就被用绳索捆绑拉到牛栏岭黄家祖坟处，参加押送的民兵有黄树松、黄秉峰、黄龙先、黄成先、黄官先、黄勤先、黄启先、黄景文、黄景就、黄景兰、黄应先、黄秉光、郑忠、施吉星、施居信等10多人，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押送的人将坟地挖开后，没有发现什么枪支子弹，郑忠就问黄泽先：“你在土改时，喊我不要动干什么？”泽先说：“没有这回事。”话音刚落，郑忠第一棍把黄泽先打倒，紧接着其他人也同时把黄仲先、干先、秉豪陆续打倒。一下就把黄泽先等四人打死了，在场的人均动手打。打死人后，已经是次日凌晨4点多钟了。这帮人回家后接着黄树松又带队抄了黄泽先家，将所抄得的财物搬到本村小学，当晚全部瓜分干净。

8月1日上午，黄树松约本村的黄应先、景就、秉晖、启先、成先、龙先、勤先等人又到县防疫站拉黄泽先之弟黄振先回来准备打死，这些人把黄振先押回到武陵墟时，当时武陵区干部采取措施进行保护，黄振先才免于一死。8月4日，逃跑的黄更先被抓回来，派民兵黄焕先送去公社押回来，走到半路黄焕先便将黄更先打死。

同一天上午，趁人出工之机，黄树松以找黄振先的妻卢秀丽谈心，了解卢秀丽与黄振先夫妇离婚是否事实，叫卢回家拿离婚证书为借口，要求卢与他搞一次两性关系，并厚颜无耻地摸弄卢的胸部和大腿，进行人身侮辱，卢当时不同意他奸污，才未得逞。

黄泽先1家5人被打死后，其母亲施黄氏当时因伤心过度而双眼失明。黄泽先的妻子施桂华带着3男1女被迫嫁到黎塘区吊塘村，后来生产队还将黄泽先家的房子拆掉，造成了家破人亡。

⑧7月31日，芦墟区人武部部长赖增杰到河田片召开河田、德明、中兴公社和原王明公社的深柳大队的干部会议，会上首先宣读“七三”布告，尔后大讲：“专政是群众专政，要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就是对贫下中农的残忍，忠不忠看行动，其他公社已经行动打死人了，我们敢不敢向阶级敌人进攻。”在会上还批评德明、中兴公社行动慢（即未杀人）。并布置以公社为单位讨论回去如何贯彻落实“七三”布告，强调定好专政对象名单。当时在会上讨论规划名单的有德明、深柳等单位。德明公社将规划27人的名单交给赖增杰。中兴公社支书李贵德、民兵营长吴日林对赖说回去开会再规划名单。会上还布置各公社回去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四类分子训示会，并说他要亲自到各公社检查督促和参加各种会议。河田会议后，德明、中兴等公社先后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和四类分子训示会。赖增杰亲自到各公社去检查落实情况。这样，在赖增杰的亲自组织、指挥、检查督促下，德明、中兴、深柳2个公社2个大队共被打死56人。中兴公社于1968年8月1日召开公社干部会议，传达河田会议精神，研究规划“专政”对象名单4人，还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次日在中兴公社召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和四类分子训示会。会前还召集了公社干部会，由吴日林向赖增杰汇报规划对象名单，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赖增杰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讲话完后离开中兴公社。群众大会前，民兵向赖增杰汇报六炭村吴日生（规划对象）关门拿刀在家，拒绝参加斗争大会，赖增杰听到汇报后，便亲自带领民兵赶到吴家，拿着手枪对着吴日生令他放下刀后叫民兵捉其到公社参加斗争大会，在批斗中民兵吴日标用柴刀割去吴日生的右耳，这时吴日生妻子带着3个小孩（大女儿吴来英8岁，背着二弟2岁，拉着大弟6岁）。赶到现场哀求：不要打死吴日生。结果连他们也被民兵用石头猛砸。当场2个男孩被打死，女儿吴来英当时被打重伤昏迷未死，第2天，被人发现后背回，吴日生的爱人韦清才被打死时，身上还怀有7个多月的小孩，这一家的惨案，群众称之为“四尸五命六含冤。”

⑨8月1日，原武陵区理化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隔壁的晒场里召开全社群众大会，批斗丘华山等10多人，会后丘华山等7人被凶手打死。丘华山被打死后，其儿子丘启宗、丘启天、丘启元（16岁）3兄弟害怕而逃到六蒙山区，当时被六蒙公社民兵捉住，六蒙民兵营长黄贵荣打电话给理化公社干部，告知了这一情况，并要求派人进山带他们回去。与丘启宗同村的公社干部丘昌辉获悉后，当即写了张证明带回村与该村的公社革委委员丘昌渭商量，决定当晚召开党员、骨干会讨论。当晚，丘昌渭、丘昌辉等人在新安村小学校主持召开全村的共产党员、民兵骨干会议，会上讨论了丘启宗等3兄弟外逃问题，为了灭绝全家男性，会议最后决定派丘昌渭带领丘昌海、丘昌紫、丘昌敬、丘德恩、丘德琼等7人到六蒙老毛村。次日（8月2日）早上，他们与六蒙民兵营长黄贵荣交接人后，便将丘启宗等3兄弟押回来，约莫走过几个山弯，丘昌渭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将他们按倒在地上，一阵口号声过后，丘启宗、丘启天、丘启元等3兄弟便倒于血泊之中，惨死在丘昌渭等人手里。人死后，这帮凶手从死者身上搜出7元多钱，回到



武陵饱食一顿。打死人后的第2天，丘昌谓还带领该村几十名民兵抄了丘启宗的家，将家中的书籍及贵重物品抢劫一空。

⑩8月2日，原黎塘区补塘公社在本社办公室召开大队定工干部紧急碰头会议。由民兵营长杨泰琼传达区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精神，会上，杨说：“贯彻执行‘七三’布告，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要学习新宾、学习（黎塘）三和大队的经验，把四类分子统统干掉。”支书侯有诗说：“根据武装部长韦善强的指示，对四类分子要实行专政，我们大队是否把四类分子统统干掉，大家讨论。”大队革委会主任吕钦声说：“干脆做（杀）去，这帮人一个也留不得。”会计张洪珍说：“我们大队有人参加‘反共救国军’被公社点名批评，干脆把他们统统做（杀）去！”民兵副营长张建祥说：“这帮人气焰比较嚣张，干脆把他们做（杀）去。”大家发表完意见，就决定由民兵营长杨泰琼、副营长张建祥2人负责指挥，全大队统一行动，把受害者押到北沟旧矿窑打死投进窑去。根据会议决定当晚即召开全大队民兵排以上干部和纠察队紧急会议，要求分工包干，以村为单位落实“专政”对象，会上杨泰琼亲自点新岭村13人，并负责组织打死；吕钦声点名新埠村4人，负责组织打死；张建祥负责补基村7人，侯有昌负责三择村13人，张洪珍点名并负责吊塘村2人。全大队共定出39人的名单。最后，由侯有昌宣布会议保密纪律，强调透露消息者后果自负。第2天（8月3日）杨泰琼、张建祥统一指挥民兵纠察队把以上规划的人员押到指定地点。民兵纠察队站在背后二、三米处。杨泰琼打手势，黄怀瑞吹口哨，发出杀人信号，杨世祥就开火，其余纠察队员一拥而上，逼近射击，瞬间就把37人全部打倒（这些受害者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处于昏迷状态），杨泰琼、张建祥带头把尸体丢入窑内水中，其他成员也跟着动手，把37具尸体全部投入矿窑水中。事毕，杨泰琼、张建祥立即把大队民兵队伍拉到高岭村，又打死杨春高、杨春展2人。这样，当天受害群众共39人。与杀人有关的人员共36人，其中国家职工2人（均系打死人后参加工作），社员群众34人。

1968年7月初，黎塘区青山公社因病退職在家的原宾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老游击队员黄世济，被捉到黎塘中学关在一间小房子内进行批斗、审讯，被捆绑吊打，罚他跪在尖利的碎瓯碗片上，膝盖骨头都露出来，一连折磨6天，行走不得，危在旦夕，这样才叫家人拉回家治疗，刚能扶床行走。同年8月3日黎塘区武装部长韦善强又指定黎塘中学红卫兵罗文兴等4人带着手枪、刀等凶器去杀害黄世济，当时黄世济病重睡在床上，罗文兴、丁家茂2人从窗口朝他连开数枪，将黄世济打死在床上，这样还不罢休，梁彪又走进柴房去用长茅刀向黄世济的肚子捅了一刀，肠子流出，黄世济从床上被拖丢下来，过了半小时，公社干部又派民兵莫若富、黄金龙等人用木梯将黄世济尸体抬到黎塘线路器材厂公路旁，在尸体上挂上反共救国军师长黄世济的下场的牌子，陈尸示众3天，在批斗黄世济时，罗兴文等人还抄了黄世济的家，抄走黄金、金戒指、现金、粮票、自行车等财物。

### （三）

8月2日，王建勋又召开了有各区革委会主任和武装部长参加的所谓“刹车”

会议，会上王建勋说：“七三”布告后，广大革命群众主动向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虽有一些缺点也是对的。对敌人专政就是对广大革命群众保护。……前段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同志们应讲究策略，不要再杀了，杀多了，杀罪大恶极的得了。……对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矛头主要对准他们。要检查检查，目标对准没有，对于叛徒在过去叛变中有没有血债？有血债是否应杀？交群众讨论，由群众决定专政，但在专政前必须批判斗争，群众弄清他罪恶再处理。抓住特务不能放，经过斗、批，然后把他事实摆出来，要有证据，这些人群众不专他的政，送到军管会也专他的政。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愿意改正的走资派还是可以杀，对顽固的也只好处理，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说明他有现行破坏活动，就要杀他的头，交群众专他的政。……小学教师已关的要送来，最后，要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后要放到生产队劳动，但不打死，批判斗争可以。公社革委主任和武装部长会议结束后，各区、社回去进行所谓“刹车”，又发生了几起严重杀人事件。

①8月2日，王建勋打电话问邹墟区革委会主任韦子林：“你们今天有拉到街上打的吗？”韦说：“有，十几二十个。现在我们正在开会强调，今后不得拉到墟或公路旁来打了，由各村就地处理。”王说：“对！对！对！就这样办。因为我们这条公路通往柳州，影响不好，又影响卫生。”

8月3日，县驻邹墟区同德公社宣传队长覃在英在区听完革委会传达王建勋8月2日所谓“刹车”会议精神后，打电话给公社干部通知原来规划“专政”的18个对象（即：李官护、李有桐、李有梅、李有道、李锦乾、李庆彪、李生余、覃兰香、覃其德、覃国安、覃彩连、覃香松、谢护祥、谢圣贤、黄庆春、谢圣编、李连芳、覃彩云）每人自带一条绳子到公社集中，覃在英散会回来后，当即布置召开骨干会，并在骨干会上明确群众大会由谭春林主持，大会按覃在英的布置，谭春林主持，谢盖贤将18名“专政”对象的所谓“罪状”一一宣布，用带来的绳子将他们绑起来，拉到独石江边，用木棍全部打死后，把尸体丢到江中。其中生产队干部覃彩云，当日还在田里劳动，公社干部通知他立即回公社开会，他急忙转回家中，衣服没换，水没喝一口，拿了语录本和一条绳子赶去，刚进公社大门就宣布他是坏分子，将他捆绑起来，他向公社干部哀求说：“我没有什么罪，请留我一条命，做工养小孩。”结果还是被打死。这些人全部被打死后，覃在英还布置整理死者“罪状”，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各村。

②8月2日，原新桥中学校医兼校革委会副主任韦志明、赵柏林（该校“红联”组织政委）、黄家成（该校“红联”组织司令员）等人，在新桥中学召集“红联”组织的学生李昭尚、李德发、韦春彰、覃华进、韦群英、谭凤金等10多人到李仕杰房间开会。韦志明在会上讲：“‘七三’布告下达后社会上对那些牛鬼蛇神已经专政了。我们学校要紧跟形势。陈天杞（校长）、杨受传（教导主任）是大地主，李武俊（总务主任）、黄罗本（教师）也是地主，还留这些牛鬼蛇神做什么？覃冠明（教师）在上思县教学时逼死过一个学生，杨永青（会计）是三青团，

账目又不清，马颜秋、何乃团（均是学生）以前组织一帮人抄过我的家，围攻区公所。赵柏林还被他们打过，你们要把这些人抓回来批斗。”赵柏林接着讲：“我们要紧跟形势，把这些牛鬼蛇神铲除掉，大家是否同意？”黄家成也在会上说：“现在社会上都打死四类分子。我们学校那些牛鬼蛇神怎么办？大家看做（打死）否？”与会者一致同意。散会后，赵柏林、黄家成即派人将陈天杞、杨受传、李武俊、黄罗本4人抓到53班教室逐个挂牌子，赵柏林、黄家成带领李昭尚、韦春彰、赵军江、李德发、覃华进，白国华等人把陈天杞、李武俊、杨受传、黄罗本拉去新桥尚武街推到新桥税所后面的江坪处用木棍、石头、铁枝打死。当日，赵柏林还亲手起草了001号布告，张贴于新桥街上，公布陈天杞等4人的所谓罪状。同年8月3日，黄家成带领李昭尚、覃华进、韦春彰等人，到新宾公社共和大队，把在家养病的覃冠明老师捉回学校，当晚，赵、黄2人在53班教室组织10多名学生对覃冠明进行批斗、殴打，后关在一间空房里，逼覃写交待材料，造成覃冠明于当晚深夜上吊死亡的后果。同年8月4日，黄家成又带领李昭尚、覃华进到高田公社去捉不同观点的马颜秋回校，当晚赵柏林、黄家成在53班教室纠集学生斗打马颜秋，第2天，赵、黄2人组织学生将马颜秋拉到学校附近江坪处打死。同年8月6日，赵、黄2人又带领李昭尚、覃华进等7名学生到新桥农中，将该校老师黄时洪捆绑到清平水库鱼塘边江坪处，覃华进即用枪将黄时洪打死。当天黄家成、赵柏林还带领学生到三友大队将何乃团捉回学校，并于当晚把何乃团斗打致重伤后，抬到该校附近江坪处由三友大队民兵开枪打死。同年8月中旬的一天该校总务会计杨永青从乡下回校领工资，赵柏林、黄家成便以账目不清为由，把杨永青抓到53班教室，组织10多名学生对杨永青进行捆绑吊打，杨受不了折磨，跳下鱼塘，黄家成和韦春彰便将杨永青压入水中几次，才拉上来，当晚把杨关在一间房里，逼其写交代材料，导致杨永青于深夜上吊死亡。同年8月上旬一天，赵、黄2人和李昭尚、赵军江等人到新桥大队和民兵将关押在大队小学的甘宝强、李国祥、杨进族3名群众拉到新桥墟头往芦墟方向的公路边用木棍、石头打死。此外，韦志明于同年8月中旬的一天还布置赵柏林、黄家成和学生去邹墟公社，将下乡工作的该校老师廖溯贤、蒙文坚抓回批斗时暗示在半路将廖、蒙打死。由于县保卫组派人赶到制止，对廖、蒙进行保护，廖、蒙两老师才免遭打死。同年9月份，廖溯贤回校后，韦志明、赵柏林、黄家成还组织学生对廖溯贤以残忍的手段进行刑讯、逼供，廖溯贤被折磨后卧床3天动弹不得，治疗20多天才痊愈。

#### （四）

1968年7、8月间，宾阳县在王建勋、王贵增、蒙伍存等人的策划、指挥下，致使全县各区（镇）、社普遍出现成批地杀人的严重事件，据统计，196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10多天时间里，共被打死和被迫害致死的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工人27人，集体职工75人，教师87人，四类分子2036人，群众1405人。全家被杀光的有14户，一家被杀2人以上的有191户，丈夫被杀致使妻子改嫁的176人。县城在大杀人高潮的那几天，到处摆着尸体，达到了汽车难

以通行的程度，因而出现了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被铲草除根，全家灭绝；有的被杀人劫财，无家可归；有的人被杀后妻子被强奸和霸占等悲惨情景。

## （五）

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1983）55号以及其他有关文件精神，在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对在打死人案件中有牵连的人员分别进行了处理，案件牵连的人员中已调出宾阳的，也分别寄出证明材料及我县的意见，要求所在单位按政策给予处理。对“文革”期间被无辜打死和迫害致死的人员进行了平反昭雪，对其遗属做了善后工作。

## 宾阳中学事件

1967年上半年，宾阳中学师生分别成立了“红卫兵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和“红卫兵中学生司令部”，简称“红中司”。“红联”（联指）派组织。由于得到当时军管会的支持，撑起了“造反大军”的旗号，大打出手，对原宾阳中学校长韦士民以及蓝成瑞等老师和部份学生，横加迫害，肆无忌惮地进行揪斗，并任意残杀，致使韦士民等人被迫害致死，蓝成瑞等5位教师被无故杀害，黄旭球、蒙朗豪、林国彰、覃展芳等25名干部、学生、群众也分别惨死在这些人的手里。整个事件被害死30人，造成了当时宾阳轰动一时的“宾阳中学大惨案”。

### （一）逼死校长韦士民、残杀学习老师

韦士民是参加地下游击队的老干部，“文革”前历任宾阳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文化大革命”动乱中被扣上“走资派”、“叛徒”等帽子，多次被揪斗、游斗、强迫劳动，隔离审查。1968年5月13日，当时宾中“红联”司令员张兵、副司令员莫孔才说《广西日报》刊登的广西叛徒名单中有韦士民名字，张兵还说：“韦士民的战友揭发他曾被捕叛变过，写过自首书，但他从未交待，如果我们挖他（指韦士民）出来，并使他承认自己是叛徒，这样，我们不是为人民立新功吗？”于是，张兵、白平明（“红联”骨干）等人就以“红联”司令部的名义写出了逮捕证，张兵亲自出马，带领莫孔才、白平明、郑桂旦（“红联”参谋）、唐平飞（“红联”、作战部部长）、余绍显（“红联”副司令）、曾德熹（“红联”骨干）、黄华山（“红联”骨干）、白绍辉（“红联”骨干）朱积生（“红联”骨干）等到宾中保育院韦士民的住处出示“逮捕证”，将正在与老师闲谈的韦士民踢倒，捆绑，随即拉到“红联”司令部，严刑拷打、审讯，追问韦“叛徒事件”，没有结果，尔后又将韦士民押到宾中红楼后面女生宿舍的一个房间里写交代，并安排人严加看管，强迫劳动及拉出校外参加陪杀等。1968年7月31日下午，韦的爱人施如梅送饭给韦不见，即报告“红联”组织，并到处寻找。后来，“红联”红卫兵骨干韦子勇首先发现韦在学校猪栏上吊。次日上午张兵向当时新宾派出所报称、发现韦士民于学校猪栏自杀身亡。于是原新宾派出所所长黄兆仁、干警陈永俭、新宾法庭庭长林伟良等3人即赶来现场验尸，以肉眼观看，未发现尸体有什么伤痕，当时没有做验尸记录，也没有拍照，就马上离开现场。韦士民死后，张兵、白平明说：“韦士民上吊死有余辜，死了也要让人家知道‘叛徒’的下场！”于是张兵

派黄华山叫陈宏才、雷启洪、黄彬才、朱炳阳等老师用木车将韦士民的尸体拉到芦墟游街“暴尸”，并在木车上挂上一块大牌写着：“叛徒走资派”韦士民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叫拉车的人边喊边敲锣，从宾中拉到芦墟，经菜市过旧银行，然后拉回学校，拉到新宾冲锋岭掩埋。埋时，不准用棺材，真是凶横至极，毫无人性。

无故杀害蓝成瑞等4位老师和1名干部。1968年中央关于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七三”布告下达后，“红联”派将“四·二二”派赶出了校门，并抄了他们的住所。同年7月的一天，“红联”骨干曾德熹、曾光常将抄“四·二二”据点时缴获的土制地雷拿出来分解，引起爆炸，曾德熹被炸断右手腕，曾光常被烧伤胸部和脸部。事后，“红联”红卫兵便认定这是原化学老师赖元蜚制造并有意用来杀害他们，因而对赖元蜚老师及“四·二二”怀恨在心，扬言要“以血还血”。特别是受伤的曾德熹、曾光常更是恨之入骨，说一定要报仇。

宾中“红联”组织，为了给被炸伤的曾德熹解决接假肢费用问题。于1968年7月28日上午在宾中红楼召开“红联”全体成员会议，由张兵主持，发动捐款。讨论中，大家认为款额太大，无力捐助，于是改变筹款方式，决定向学校要一部分，向“红联”上级请拨一部分，会后由张兵去向学校原副总务主任吴海俊要钱。吴说，学校没有这笔钱开支，并讲了一些对“红联”不满的话，因而引起了“红联”的极大不满。接着，张兵、莫孔才、余绍显、白平明等经过商量，决定再次召开“红联”全会。于是在副司令余绍显主持下，又召开了第二次“红联”全体成员会议。会上，张兵先汇报了向吴海俊要钱不得反被“辱骂”的情况，接着莫孔才讲了曾德熹的手被炸断、曾光常被烧伤是“反革命分子赖元蜚做的炸弹造成的”和“红联”如何如何受压等煽动性的话，更激起了到会人员的“极大愤慨”，会上“群情激昂”。当场，白平明、覃作平、朱积生等咬牙切齿地说：“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要镇压他们几个，使他们懂得‘红联’厉害。”韦子勇等还将手枪拍在台上，摩拳擦掌，并提出要镇压吴海俊、赖元蜚。“红联”骨干黄华山，曾光常又提出不但要惩办赖、吴，为了以后我们能安心读书，还要严惩杨锦铨、潘志诚（杨、潘当时是学校“四·二二”派头头）。白平明还说：这还不行，还得让那些地富出身的老师回来看，领教领教“红联”的厉害。上述主张得到与会人员的支持。会议决定由白平明起草计划要杀害的老师的“罪行”，以便向群众公布。张兵最后在会上作总结，声称：“这次大会开得很好！是战斗的动员大会，王副师长（王建勋、驻军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还批评我们行动太慢了。这件事情决定下来后，如果以后有人为此事找到头上，大家必须敢于承担责任，不能全部推到某个人身上，应该说是全体‘红联’通过的。”会议还决定，凡持枪者，枪杀老师那天都到现场维持秩序。参加策划会议的人员有：张兵、莫孔才、余绍显、白平明、黄华山、程光英、郑桂旦、朱积生、曾光常、韦子勇、张鹏芬、覃作平、唐平飞、马玉凤、韦月秀、余小珠等二十几人。

会议后，“红联”则决定下乡捉拿计划要杀害和陪杀的老师回校（当时绝大部分教职员都作为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到大桥区和黎塘区的部分大队工

作)。于是，张兵、莫孔才、白平明等负责人就亲自组织力量下乡抓人。1968年7月31日由黄华山、程光英、覃作平、张鹏芬、唐平飞、郑桂旦、邓延昌、韦忠英、朱积生等到大桥区红桥、新道去抓成克英、朱炳阳、黄彬才、舒文忠、莫福宝等。8月1日，由韦子勇、白平明、邓延昌、郑桂旦还有老师谢东、陈文磊一起到黎塘区司马公社抓余任贤、蓝成瑞、陆之铭、罗书栋等。这一天是用汽车从黎塘农科所把要抓的上述4人送回学校的。他们计划抓的人中，除舒文中、莫福宝（因民兵阻挠未能抓回）和杨锦铨、潘志诚外出未抓到外，其余的都抓了回来。赖元蜚老师则是从原籍容县回校复课闹革命，刚到校就被张兵、黄华山、郑桂旦等人抓了起来。捉拿这些老师过程中，被抓的老师都被搜身索取所有财物（包括手电筒等日用品），并被捆绑及遭到不同程度的踢打。回到学校后又关禁在女生宿舍，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与此同时，他们还从外地抓来县邮电局林邦洁、黄某某等2人关押于校内。此外，在7月24、25两天内，莫孔才还指挥“红联”骨干朱以善、林国华、韦子勇等抓回“四·二二”派女学生余幼玲、刘胜南等6人非法关押校内进行拷打、审讯，甚至进行人身侮辱，长达一星期之久。

8月1日下午4时许，“红联”负责人白平明等命令刚被从黎塘公社抓回的蓝成瑞、余任贤、陆之铭、罗书栋4位老师跪在学校内大榕树下，强迫各人低下头来，不许东张西望。当时韦子勇等还踢打蓝成瑞老师，几次把蓝踢倒在地，又把他拖起来跪，并且骂蓝：“你蓝成瑞想死还是想生！”蓝成瑞老师气愤地说：“我已60岁了，死就死吧！”接着又是一阵脚踢，并有人提出拉出去干掉。于是白平明、韦子勇等便把蓝成瑞老师推出去，并令陆之铭、余任贤、罗书栋3人跟着，押至现宾阳汽车中心站旁公路往横县方向的拐弯处后，韦子勇（已故）即开枪打死蓝成瑞。陆、余、罗3位老师分别跪在蓝的后面陪杀。

8月2日，由“红联”司令张兵、副司令莫孔才、余绍显以及白平明等召集在校“红联”红卫兵，在校内办公楼外大榕树下首先批斗赖元蜚（当时赖被用铁线捆绑得很紧，呼吸极端困难）、吴海俊、余任贤等3位老师。后来他们又令陆之铭、黄彬才、朱炳阳、成克英、罗书栋等老师到场陪斗。批斗一阵子后，张兵对在场的红卫兵说，挂一个牌子给他们（指赖、余、吴）。接着红卫兵就给赖元蜚、余任贤、吴海俊3位老师分别挂上“反共救国团总工程师赖元蜚”、“国民党残渣余孽余任贤”、“大坏蛋吴海俊”的大牌子。尔后便把要杀和陪杀的老师及原关押在宾中女生宿舍的林邦洁、黄某某2人，在校内批斗后，就把他们拉到新宾游斗。在游斗前，张兵、白平明等强调，所有在校内的“红联”红卫兵一律参加，特别是带有武器的红卫兵。一路上，张兵指挥唱语录歌，白平明负责领喊口号，游到原新宾邮电支局对面街中心时，停下围斗。张兵把早已写好的3位老师的所谓罪状交给“红联”成员马玉凤上台宣布，并叫3位老师逐一认罪。完毕，张兵、郑桂旦等即假问群众说：“怎样处置这些人？”当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叫“干掉”时，张兵则下令：“出发！”于是，红卫兵则将吴海俊等10个被斗对象往宾贵公路方向押送。队伍行将出发时，张兵还叫唐平飞、黄华山到医院通知正在住院治疗的曾德熹出来。将要到达宾贵公路一公里（即飞鹅岭脚）时，莫孔才、白平明

命令队伍停下，随即下令唐平飞、黄华山、韦子勇、马玉凤等将押送去的人推到公路旁水沟，进入乱坟地，然后由白平明命令他们面向新宾中学方向跪下，一字排开，陪杀的人靠右边，旁观的“红联”红卫兵和群众也跨过水沟围成半圆形。这时，曾德熹在陈志超陪同下到达现场后，便由唐平飞推出吴海俊，黄华山推出赖元蜚，韦子勇推出余任贤跪下，后由莫孔才、张兵等具体安排：曾德熹枪杀赖元蜚、黄华山枪杀吴海俊，唐平飞枪杀余任贤。张兵首先示意曾德熹要程光英的二号驳壳枪打赖元蜚。张兵、白平明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白平明才下令“预备”“放！”曾德熹开枪把赖元蜚打死，唐平飞开枪打死余任贤，黄华山开枪打死吴海俊。接着，韦子勇、马玉凤、张兵、程光英、郑桂旦等又分别补枪。在杀害3位老师以后，张兵又用手抓住被陪杀的朱炳阳（当时朱是张的班主任）老师的头发大声喊道：“这就是朱昌奎（解放前宾阳有名的大地主，解放初期被枪决）的儿子！”当时无人答腔，却有在场的另一群众指着陪杀的邮电局的林邦洁说：“那个姓林的是个坏蛋！”话音刚落，他们又把林邦洁推出去枪杀。此后，张兵、莫孔才、郑桂旦等还命令陪杀的黄彬才、成克英等人上前翻尸，看被枪杀者是否被打死。约下午6时许，他们将剩余的人员押回学校继续关禁。

1968年8月2日枪杀余任贤后，程光英、李先宁，朱以善等人到余的宿舍抄得一本存折，内有存款600元，事后张兵、莫孔才提议将此款给曾德熹到上海装假手用。第二天曾德熹由陈志超作陪到芦墟储蓄所提款。街上碰到黄华山，黄也一同去作提款证人，得款后曾德熹便往上海治疗。

## （二）围剿杀害“红中司”学生。

1968年6月18日，“红中司”头头黄旭球、吴俊宇等人抢新桥武装部武器逃宿在新桥程村，而被民兵包围。张兵、莫孔才闻讯后，即带唐平飞、程光英、覃作平、韦子勇、郑桂旦、黄华山、马玉凤等人赶到程村与民兵共同包围“红中司”学生，围到半夜，还没有攻下程村，民兵就到清平水库搬来炸药进行强攻。凌晨，唐平飞持炸药包先炸开大门，又炸毁一间民房打开了缺口。接着黄华山、郑桂旦等人和民兵不断朝“红中司”据点开枪射击。6月19日天刚朦亮，对方黄旭球被击中身亡，“红中司”学生黄阳生等拖着黄旭球的尸体出来举手投降，“红联”学生程光英、黄华山、唐平飞等人冲上去夺他们手中的枪。唐平飞、程光英各夺得一支二号驳壳枪，黄华山夺得一支加拿大手枪。最后民兵又将所谓俘虏的7个“红中司”学生和2个社会青年押回屋内进行集体枪杀，接着“红联”学生黄华山、覃作平、程光英、唐平飞、郑桂旦、韦子勇也向这些死尸射击。在此事件中，宾中“红中司”学生黄旭球、江超宇、黄阳生、赖宾魁、张焕礼、农隆安、王安祥、伦振安和程村青年陈信红、陈世春在投降的情况下惨遭杀害。

## （三）任意杀害干部和群众、非法抄家，抢劫他人财物

蒙朗豪（化名蒙狼狗）是芦墟镇红旗街人，在“文革”中参加“四·二二”派群众组织，1968年7月去南宁参加武斗。后被俘，由当时在南宁参加武斗的“红联”学生林国华、唐平飞、刘庆宾、黄华山、莫孔才等人，把他和李共和抓回来关押在宾中。一天晚上，张兵、莫孔才、白平明，林国华等人策划，莫孔才、

程光英、郑桂旦、白平明、覃作平等将蒙捆绑并挂上牌子，押往芦墟。到通往南街三叉路口时，覃作平用七九步枪将蒙朗豪打死。

林国彰是原县工商联干部，芦墟镇解放街人，家庭出身工商兼地主。在“文革”中被靠边站，下放到县农科所劳动。1968年8月2日工商联干部蒙堂卿去宾中叫“红联”学生来处理林国彰。当晚上9时许，“红联”学生刘庆宾、李先宁等人按照蒙堂卿约定的时间去到县农科所把林国彰捆绑拉到陆村头，刘庆宾用七九步枪把林国彰打死。

1968年7月28日新廖公社规划打死地主分子覃展芳和富农分子张建民2人，当天下午由会计廖镇昌打电话与宾中“红联”联系，请求支援，张兵表示同意派人协助。晚饭后张兵叫白绍辉找来莫孔才、郑桂旦、唐平飞、程光英、余绍显、林宝祥等人商量，并决定将关押在校的老师陈洪才、雷启洪和新宾粮所干部熊家保等人带去新廖陪杀。晚上约八、九点钟，由黄华山、覃作平、韦子勇等推着捆绑的覃展芳、张建民，由郑桂旦押着陪杀的人，到铜鼓岭脚现场，黄华山、覃作平、韦子勇等开枪打死覃、张二人。张兵用枪指到陪杀的熊家保胸膛说：“你要老实交出‘反共救国团’名单来，不老实下场就这样。”

1968年7月31日下午，新廖大队又开会研究决定杀9个人，由民兵龚祖祥打电话与张兵联系请求支援，张兵同意协助，答应当晚12点钟前派人去，张兵与莫孔才商量后，派林国华、刘庆宾、朱积生、程光英、黄大章、李先宁、黄华山、伍铭善等人由莫孔才、白平明带队到新廖与民兵一起将四类分子集中。然后由治保主任吴克义点名称出邹宾奎、廖荣森、廖建森、廖大妹、覃维梓、覃益芳、覃荣芳、覃启寿、张建邦共9人，交由上列学生和新廖民兵覃富忠、莫影然拉到新宾汽车站三角地枪杀。

磨良柱原是宾中学生，“红中司”骨干。磨良杰是复退军人，是“红中司”聘请去当军事教员。“红联”怀疑磨良柱和磨良杰2人有枪支。张兵带领白平明、莫孔才、唐平飞、郑林旦、程光英、丁玉超、黄大章、刘庆宾、李先宁、朱以善、白绍辉等人，于1968年7月的一天晚上，到新模村抓磨良柱与磨良杰。抓到后人后得不到枪支就进行抄家，磨良杰被抄走一台收音机、一块手表。并把磨良柱、磨良杰抓到宾中关押斗打。磨良杰从宾中放回去后被群众打死。

王丽瑚是宾阳医院的医师，“文革”中参加“四·二二”派群众组织，1968年7月，在落实“七三”布告期间，张兵、郑桂旦等人怀疑王是特务，就到医院抓王到宾中关押斗打审讯。王被抄去一个电动胡须刀。

李共和原是县五金公司采购员，“文革”中参加“四·二二”派群众组织，1968年7月下旬被黄华山、林国华、唐平飞、刘庆宾、白平明等人从南宁抓回来关押在宾中审讯斗打。李被抄去现款92元、手表一块、收音机一台、粮票90斤。

熊家保是新宾粮所干部，在“文革”期间参加“四·二二”派群众组织，“红联”怀疑熊参加“反共救国团”。1968年7月的一天，张兵等人到粮所抓熊到宾中关押审讯，被毒打至昏泼冷水才省人事，后来被拉去陪杀。

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对直接制造和参与“宾阳中学事件”的为首者，



我们已经进行了严肃处理（指现在县内工作）。

张兵，宾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宾中红联”）司令，原任县水泥厂生产股长，中共党员。给予清除出党，行政开除公职，追究刑事责任处分。

唐平飞，宾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宾中红联”）作战部长，现任县水电局助理工程师，中共党员。给予清除出党。

林国华，宾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宾中红联”）骨干，现芦墟派出所工人，中共党员。给予清除出党。

黄华山，宾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宾中红联”）骨干，现是县志办干部，中共党员。给予清除出党。

郑桂旦，宾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宾中红联”）骨干，现任大桥中学教师，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程光英，宾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宾中红联”）骨干，现任大桥乡大程村教师，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对已调出县外单位直接参与“宾阳中学事件”的骨干莫孔才、余绍显、白绍辉、黄大章、曾德熹、邓延昌、刘庆宾、朱以善等，我们已分别寄去证明材料，同时提出我们意见，要求这些单位给予他们党、政纪处分。1983年“处遗”工作以来党和政府对受害者家属分别做了善后工作。

### 邹墟区“六四”事件

1968年5月28日晚上，邹墟小公社的骨干在公社办公室批斗邹墟街“坏分子”邹玉保，邹墟街社员唐平岳（当时为“四·二二”派成员）寻找生猪路过此地，趁机看批斗情况，维持会场的民兵即以探听消息，想抢民兵枪支等罪名，将唐抓住，并进行关、打后，放其回家。唐回去后，将被打情况在派群众中讲开，引起不满。他们在入邹墟老街的路口开起六个闸门，进行“文攻武卫”，并想寻找机会报复对方。同年6月3日下午约2时许，唐平岳、张树斌、梁六福等人在邹墟猪仔行发现“联指”派成员冯可云（本大队下窑村人，唐被抓时，冯打过唐），便将冯抓到邹墟糖行街莫佳杰家殴打，并关闭老街所有闸门。

原邹墟小公社革委会主任、“联指”派骨干袁炳全闻讯后，立即到邹墟区公所找区武装部干事黄瑞华（黄负责“支左”）。将冯被抓走的情况向黄汇报，并请求武装部帮助营救冯，黄听完汇报后，即交代袁回去先出海报，勒令对方放人，造个舆论。当日下午五时，袁炳全便召集全社干部韦中概、韦玉山、熊兴保、蔡永才等人开会。会上袁说：“冯可云被抓，挨打很厉害，大家看怎么办？我已向区汇报，区叫出海报勒令放人，不放后果自负。”还说：我们回去要作好准备，如果邹墟街“四·二二”不放人，我们就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

6月3日傍晚，袁炳全等人书写的勒令放人海报贴出后，唐平岳等人便将打得蛮伤的冯可云偷偷放出来，冯当即回家。晚上八、九点钟左右，袁炳全即布置该社民兵包围邹墟街，并打电话到邹墟区的白山、古莲、新华、永和等四个公社，要求派民兵支援。袁炳全唯恐这些公社民兵不到，又在新窑手工业办公室打电话

到区找黄瑞华和区组织委员、“联指”派头头颜炳忠，找不到，袁即对接电话的区干部庞善棋说：“我们的冯可云被邹墟街‘四·二二’抓了，我们公社组织民兵营救，将邹墟街包围起来，到半夜3点多钟再放一轮枪，要‘四·二二’宿龟街堡，以一网打尽，我们就可冲入街内抢回冯可云。我们力量不足，要求你们马上通知各社民兵支援，意见如何？”袁还说：“我已通知白山、古莲、新华、永和等公社。”庞接完电话后，立即分别到黄瑞华、颜炳忠房间请示，黄瑞华同意调动民兵，并亲自打电话给古莲公社民兵营长韦凤新，叫韦亲自带领民兵来围攻邹墟。颜也同意调动民兵，并布置说：“同礼、古莲两社民兵守邹墟东面的渡口，并将船靠东岸，防止‘四·二二’过渡逃走；同仁、永和两社民兵守邹墟粮所和邮电所的岭，不准他们南逃；白山、新华、邹墟等三社守六新到石牛路口，不准他们向西、北逃走。”并叫庞善棋、李寿明负责用电话向各公社传达。为了同各社联系，区把电话机搬到三楼中厅，由李寿明、庞善棋轮流值班守电话机，并按照颜、黄的布置分别打电话催促各公社迅速调动民兵来包围邹墟街。

当晚10时许，白山、古莲、永和、新华等10个公社的民兵500余人，陆续赶到了邹墟，并带来轻机枪10挺、冲锋枪10支、步枪127支，按颜布置的地点，将邹墟街团团包围。袁炳全亲自到邹墟街附近的三拱桥布置该社武装民兵吴德明、韦汉德、韦士英等武装民兵守好邹墟街西面公路，布置白山民兵受命中，其中“四·二二”派群众20多人被绑在公路边跪下，袁炳全亲自指挥民兵梁支凤开枪打死邹宗明、钟良元；指使民兵韦德兴开枪打死颜少琼。当日被赶到广场集合的群众共被打死13人。

整个事件过程，“四·二二”派群众没有还击一枪，战后也缴不到他们一枪一弹。却造成唐平岳、张树斌、梁其福、韦嵩雄等28人被枪杀，其中国家干部3人，工人2人，现管坏分子1人，群众22人，烧去房屋3间，被抢走财物价值约2万元。

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对“六四”事件的首首者黄瑞华、袁炳全已追究了刑事责任；对参与“六四”事件的主谋、策划者以及案件涉及的人员，颜炳忠、黄用芳、庞善棋、李寿明、韦中概、韦玉山等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83年“处遗”工作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对被害者家属做了善后工作。

---

## 【简讯】

# 让更多公民、更多青年来记录历史 ——“2013 历史嘉年华”活动圆满结束

宗 庶

2013年11月14~17日在苏州金鸡湖畔中国金融博物馆举办的“历史嘉年华”，是2010年以来民间历史记录与行动者一年一度的聚会，其前身是“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原《看历史》杂志主力人员创办的新历史合作社将

其发展成了更强调观众互动的开放性公共历史节。这次活动由新历史合作社与中国金融博物馆共同发起主办，中国基金博物馆承办，腾讯网、大苏网协办。本次活动主题是“我写我历史”，以“有关、有趣、有用”为理念，以“记忆分享，公民参与，承继传统，激活历史”为宗旨，通过讲述、沙龙、论坛、表演、展览、评选等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向公众展现历史的价值和趣味，并启发公众参与历史记录的热情，强调每个个体的参与（用自己的眼睛看历史，用自己的耳朵听历史，用自己的心记录历史），推动公共历史在中国的发展。

“历史嘉年华 2013”包括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我的历史”公民写史研讨会，讲座，对话（《炎黄春秋》主编、历史学家吴思和同济大学教授王晓渔进行了对话），纪录片放映，培训交流（“个人写史培训班”邀请了作家冉云飞、十年砍柴，媒体人何三畏，崔永元口述团队首席记者张军以及纪录片导演张钊维介绍经验），并有向每年评选出的个人或团队致敬的“国家记忆 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等系列活动，是一次多元多彩的公共历史盛会。活动期间，新历史合作社宣布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项目发起合作，组建一个民间历史平台“我的历史”，为个人写史提供系统性、规范性的帮助。

获得今年年度历史记录者奖的是四位参加“课本上读不到的历史”写作比赛的获奖中学生，其中王颖同学在访问家人后写文记述了她的曾祖父（一位地主）。

年度致敬者的最高奖项颁给了 86 岁的张思之律师。

年度历史图书写作奖的获得者是现居美国的王鼎钧先生，他的回忆录四部曲已经在大陆全文出版，值得一读。

在“中国词汇”的一节中，放映了短片《政审》。讨论时，因提到“早请示、晚汇报”等已经消逝的历史词汇，听众希望有人当场示范，熊景明“临危受命”上台示范了“早请示、晚汇报”并跳“忠字舞”，笑翻一群人。

在年度历史行动者致敬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场面：主持人熊景明与潘鸣啸（法国汉学家）搬了两把空椅子上台，不见被致敬者到场。原来，这项活动是向“文革”道歉者致敬，主办方新历史合作社在两个多月前就通过邮件、电话、朋友转达等方式对人关人士进行了邀请，但不管是出席会议还是拍摄微纪录片，这些道歉者都表示拒绝。他们都认为近期媒体宣传已经够多，希望为此事打上句号，道歉只是做人底线，不敢逾越，不想用此炒作，也不敢担当“历史行动者”之类头衔。一位道歉者在回复邮件中恳切地说：“一句道歉并不能折抵当年罪错，如今若换回什么‘荣誉’，那岂不坐实了别人说你沽名钓誉的指摘？”

最令人感动的是许多年轻人自费来参加活动。四天的活动高潮迭起，富于创意，颇有深度。主持操办的新历史合作社是唐建光为首的十一位年轻人的团队。为办好这次活动，有些人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赞助方当然也功不可没。他们都是应该得到人们致敬的历史行动者。

---

【编读往来】

## 阎长贵谈抢救文革史料

读了上期何蜀的《志愿者可以为文革研究做些什么》，很有感触。有80后的博士主动来谈文革研究问题，太令人高兴了。王年一生前多次谈到文革研究后继乏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值得70岁以上甚至60岁以上的人认真考虑了。陆小宝说：回忆文革，把文革历史真相留下来，是“我们这代人的最后责任”，同样，怎样使文革研究后继有人也是我们应该着力做的一项重要工作。研究文革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把文革历史事实即真相搞清楚，搞准确，因此抢救（确实是抢救！）资料十分急迫。9月份我去上海遇到的一件事情使我痛切地感到这点。半年前，即3月份去上海时，我的大学系友、给林彪当了7年（1964~1971）秘书的李春生到宾馆看我，我们谈好：应该把自己所经历所知道的情况都谈出来、写出来。我把他介绍给正在研究林彪的王海光教授，此后他们相互通了七八封信，谁能想到这几封信竟成了他的绝笔！仅仅半年的时间，我这次去上海，惊闻他走了，而他才76岁。

时不我待。一切这样或那样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所知道的文革的真实情况回忆、记录下来，一切愿意和有志于研究或帮助研究文革的中年人、青年人，也当关注这点。何蜀文中谈的那几个方面都很重要，都应该去做，并做好。在这几方面的工作中，赶紧通过健在的、经历过文革的人抢救活材料，似值得特别注意。

## 熊景明谈文革史料与志愿者

不时有人拿自己费尽心思收集的一些文革资料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询问是否需要，而不知道中心所收藏的资料比他手中的更齐整而且已经“面市”。同时，到中心来还可以自由查阅不受任何限制。

除了已经出版的这套《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还有美国中国资料中心收集并出版的三批红卫兵小报汇编（共20+31+52册）。这套资料囊括了几乎北京所有高校的铅印红卫兵报。地方的小报则还不全。

资料的收集永无止境。特别是地方资料还很不够，地方文革研究在许多地区，例如某些县，还几乎是空白。

年轻的志愿者如果能着手研究自己家乡的文革或搜集相关资料，定将大有作为。对文革有兴趣的年轻人，采访自己的长辈、亲友，或者当地风云人物，或者当地一个文革中突出的事件，都可以成为重要的民间历史记载。

## 王春南谈“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张教授为纠正官式文革研究有意无意散布的谬误，做了大量工作，大有功于文革研究。这种求实存真的精神令人敬佩。

文革结束近 40 年来，造反派这个概念已很模糊。其实造反派在文革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很短，如南京的造反派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时间为 1966 年 6、7 月至 1967 年年底，掌权（夺了几颗大印）的时间为 1967 年 1 月 26 日至 3 月 4 日，次日即实行军管。但人们（包括文革受害者）都习惯于把文革中的一切坏事推到造反派身上。如画家刘海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被判刑，有的书上说，是造反派搞的，实际是军管会干的。又如一位原常委在其书中说，清华大学造反派不给他发研究生毕业文凭，不给他研究生工资。我也是文革中毕业的研究生，没有领到研究生毕业文凭，工资按本科毕业生发给。当时负责分配的是江苏省军管会，他们依据的是中央文件，这也并非造反派所为。

造反派做的事，主要是两件：一是批斗“走资派”，二是参与打派仗。前面批斗学术权威，没有他们的份；后面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等等，没有他们的份。很多造反派，造了不到两年的反，被关了三五年甚至十几年。有的人文革中被关，文革结束又被关。给他们定的罪是“反革命”，他们参加的就是文革这个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说他们“反革命”，真是冤枉。他们是被诱导造反，奉旨造反。他们的造反行为，有毛的“最高指示”和毛签发的中央文件作依据。不能用文革后的法律，来追究文革中的造反行为。不能让造反派代毛受过。

## 张一哲对杜钧福意见的回复

1、杜先生谈到我的文章与一般历史研究论文的不同之处，他的感觉是对的。不过，我这样做却是故意为之。我有个学生应星是社会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他的几部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的著作（例如《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都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法，并注重历史细节。在这点上，我受了他一些影响。我注意到，有些国外历史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著作，也有这一特点。确实，我那几篇文章并非普通论文写法。恰恰相反，我正是要打破通常写论文的章法束缚。文中经常涉及本人亲历以及若干细节，是为了增加历史感和现场感，增强历史信息的可靠性（以至于杜先生觉得“更像是个人的思想史”）。文中的感情色彩以及故意强调某些侧面，主要为了有针对性地强调与主流或流行观点不同的另一面。文章对象不是设定为学者专家，而是普通人。

2、杜先生提到“清队”初期，某些还掌权造反派的责任问题。

这点我有同感。江西造反派头头万里浪，在“三查”（清理阶级队伍）初期也是跟着程世清的。比如 1968 年春天，程世清镇压南昌七中造反派（当时他们贴出了著名的“4·7 意见”和“4·22 宣言”）时，万里浪就是积极支持镇压的。当时我曾经和万里浪他们有分歧并当面辩论过。1968 年年底，当“三查”烈火完全按照程世清部署烧遍江西时，万里浪最后不得不选择与程世清决裂并被程打入大牢。

这种情况，从政治斗争来说，也可以理解。一方面，造反派中多数人心中认可中央权威，“清队”作为毛中央战略部署，不可能反对，只是紧跟程度不同而已（具体的思想怀疑和抵制也不少见）；另一方面，具体的，还有掌权的造反派头头水平问题、观点差异和私人恩怨等因素；再者，我以为，谈这些造反派的责任也涉及到毛、江的责任。毛（包括周）和中央文革（主要是江青和康生）对这些问题都有责任。但是，从文革中政治斗争的实际考察，造反派与“走资派”、军头、保守派这些势力显然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一点，在中国，人们的思想受统治意识形态或主流观念影响是很普遍的事情。无论是文革中造反派对 1957 年右派的态度，还是今日自由派对造反派的态度，都与此有关。杜先生提到的“清队”初期某些掌权的造反派头头的表现，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与此有关。

造反派在文革中当然是有错误的。我强调的，主要是与流行观点不同的地方：一、造反派反政治迫害和反血统论、反特权（都属于争基本人权的范畴）的某种合理性；二、文革中和文革后对造反派的人权侵害的错误，以及将不属于造反派的文革罪错加之其上的荒谬性。

### 3、有关杜先生提到的唐山交大的问题。

我的文章中有关“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先生毕业于唐山交大时在贵州的信息，来自姚桐斌传记。而我舅舅刘恢先是上世纪 30 年代就读于唐山交大的。我舅舅晚年回忆说，1933 年他毕业那一年，日本人打进来了，学校匆忙撤到天津，然后转移到上海，他是在上海交大毕业的。唐山交大抗战时期是否迁往贵州，我倾向于相信姚传（抽空再查）。而我舅舅当时在贵州，是担任浙江大学（时迁往贵州）教授，因为当时浙大校长是他唐山交大校友茅以升（也是康奈尔校友）。

唐山交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办学最早（1896 年）的高校之一，曾被誉为“东方康乃尔”。林同炎、茅以升、竺可桢、黄万里等都是唐山交大毕业生。有资料说（我写作有关回忆文章时曾经查到，现在一时忘了出处），其 1949 年前毕业的学生中，后来有中科院院士 37 名、工程院院士 19 名、中科院和工程院双院士 4 名，以及（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 6 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3 名、英国皇家建筑学院院士 2 名……这样的成绩足以显示其一流大学水平。这也是一所命运颇具悲剧性的大学。现在的西南交大也许算是它的传人吧（去年我舅舅诞辰百周年时该校曾经举行了刘恢先铜像揭幕仪式）。